

分类号 _____
UDC _____

密级 _____
编号 10741



硕士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深化甘肃商业养老保险
发展研究

研究生姓名: 罗志林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柏正杰 教授

学科、专业名称: 理论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

研究方向: 劳动关系与保障制度研究

提交日期: 2024年6月5日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罗志林 签字日期：2024.6.5

导师签名：柏 己 杰 签字日期：2024.6.5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关于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各项规定，同意（选择“同意”/“不同意”）以下事项：

- 1.学校有权保留本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 2.学校有权将本人的学位论文提交至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用于出版和编入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或其他同类数据库，传播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罗志林 签字日期：2024.6.5

导师签名：柏 己 杰 签字日期：2024.6.5

Research on Deepen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Pension Insurance in Gansu Provi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pulation Aging

Candidate : Luo Zhilin

Supervisor: Bai Zhengjie

摘 要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截至 2021 年末,甘肃省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常住人口总数的 17.03%,超国际老龄化标准 7.03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上人口占常住人口总数的 12.58%,超国际老龄化标准 5.58 个百分点,这表明甘肃省已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社会问题也日渐突出,仅仅依赖于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和第二支柱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是远远不够的,而商业养老保险是一种基于市场化运营的产品,与基本养老保险的运营主体不同,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的弥补基本养老保险功能不足和减轻政府主体负担。面对人口快速老龄化,人民群众养老需求日益多样化,商业养老保险大有可为,因此甘肃需要深化商业养老保险发展,不断优化养老保障模式,增强养老保障体系可持续性来解决日趋严重的养老问题。

本文基于目前我国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大背景,聚焦甘肃省日趋严峻的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其所产生的社会问题,结合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现状,分析出目前甘肃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再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因素,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分别从政府、保险公司、公众三个角度针对性地为深化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提供实用有效的建议。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 商业养老保险 养老保障体系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data of the seventh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 by the end of 2021, the population aged 60 and above in Gansu Province accounted for 17.03% of the total permanent population, 7.03 percentage points higher than the international aging standard, and the population aged 65 and above accounted for 12.58% of the total permanent population, 5.58 percentage points higher than the international aging standard. This indicates that Gansu Province has entered a stage of rapid population aging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blem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t is far from enough to rely only on the first pillar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and the second pillar enterprise annuity or occupational annuity. However, commercial pension insurance is a product based on market operation,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operation subject of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To a certain extent, it can effectively make up for the insufficiency of the basic endowment insurance function and reduce the burden of the government. In the face of rapid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people's needs for pension are increasingly diversified, and commercial pension insurance has great potential. Therefore, Gansu needs to deepen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pension insurance, continuously optimize the pension security model, and enhance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pension security system to solve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pension problem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serious population aging problem in China,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creasingly severe population aging situation in Gansu Province and the resulting social problems.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commercial pension insurance in Gansu Provi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problems fa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pension insurance in Gansu Province, and then constructs a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by combin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analyzing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pension insurance in Gansu province, and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analysis results, draws on the relevant experience at home and abroad to provide practical and effective suggestions for deepen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pension insurance in Gansu provin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government, insurance companies and the public.

Keywords : Population Aging; Commer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Pension Security System

目 录

1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1
1.1.1 研究背景.....	1
1.1.2 研究目的.....	2
1.1.3 研究意义.....	2
1.2 文献综述.....	3
1.2.1 国外研究文献.....	3
1.2.2 国内研究文献.....	5
1.2.3 文献评述.....	9
1.3 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10
1.3.1 研究思路.....	10
1.3.2 研究内容.....	11
1.3.3 研究方法.....	12
1.4 创新点与不足.....	13
1.4.1 创新点.....	13
1.4.2 不足.....	14
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15
2.1 相关概念.....	15
2.1.1 人口老龄化.....	15
2.1.2 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15
2.1.3 商业养老保险.....	16
2.2 理论基础.....	18
2.2.1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18
2.2.2 生命周期理论.....	18
2.2.3 寿险需求理论.....	19
3 甘肃省人口老龄化及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21
3.1 甘肃省人口老龄化现状与影响.....	21
3.1.1 人口老龄化现状.....	21

3.1.2 社会影响	22
3.2 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现状	23
3.2.1 需求状况	23
3.2.2 供给状况	26
3.2.3 保费状况	29
3.3 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发展问题分析	28
3.3.1 商业养老保险监管体系不完善，市场缺乏秩序	29
3.3.2 税收优惠政策缺乏，商业养老保险发展动力不足	30
3.3.3 商业养老保险覆盖面有限，效果不佳	30
3.3.4 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种类单一，无法满足消费者多样化养老需求	31
3.3.5 公众保险认知不足，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意愿不强	31
4 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32
4.1 研究假设	32
(1) 人口因素的假设	32
(2) 经济因素的假设	32
(3) 社会因素的假设	32
4.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33
4.2.1 数据来源	33
4.2.2 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	33
4.2.3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34
4.3 多重共线性检验	35
4.3.1 相关系数矩阵法检验	35
4.3.2 方差膨胀因子法检验	36
4.4 实证分析	37
4.4.1 模型构建	37
4.4.2 对多元回归模型的相关检验	38
4.5 实证结果分析	40
5 国内外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基本经验借鉴	41
5.1 国外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基本经验	41

5.1.1 美国发展个人养老金的 IRA 制度	41
5.1.2 日本发展个人养老金计划的主要税收政策	43
5.1.3 德国李斯特养老金计划	44
5.2 国内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基本经验	45
5.2.1 上海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经验	45
5.2.2 重庆专属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经验	46
5.3 经验借鉴	46
6 深化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对策建议	48
6.1 政府角度	48
6.1.1 全力促进经济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差距	48
6.1.2 加大教育投入，提升公众风险保障意识	48
6.1.3 完善税收优惠政策，提供商业养老保险发展动力	49
6.1.4 加强市场监管，引导保险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49
6.2 保险公司角度	50
6.2.1 持续创新服务平台与内容，提升服务水平	50
6.2.2 根据当地人口、经济、社会情况，加大保险产品创新力度	50
6.2.3 加大商业养老保险宣传力度	51
6.3 公众角度	51
6.3.1 转变思想观念，提升风险意识和理财意识	51
6.3.2 学习保险理财技巧，选择合适的养老保险	51
7 结论与研究展望	52
7.1 主要结论	52
7.2 研究展望	52
参考文献	54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根据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当中划分的标准可知，当一个国家或地区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 10%，或者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 7%，那么就表明这个国家或地区迈入了老龄化社会，而在 2001 年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就超过了 7%，跨入了老龄化国家的行列，之后一直呈现上升趋势。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达到 141178 万人，其中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01 万人，占 18.70%，老龄人口基数大、比例高，相比上一次普查提升了 5.44%，老龄化程度日益加剧。

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由“三大支柱”构成：第一支柱是由政府主导并负责管理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支柱是政府倡导由企业自主发展的职业年金和企业年金；第三支柱是个人养老保险金制度，包括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目前我国第一支柱“一枝独大”，第二支柱发展缓慢，覆盖面不足，第三支柱发展薄弱。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家庭和政府压力日益加重，此时仅仅依赖于第一大支柱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和第二大支柱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是远远不够的，而商业养老保险是一种基于市场化运营的产品，与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运营主体不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的弥补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功能的不足和减轻政府主体的负担，于是国家更加重视第三支柱的发展。2021 年 12 月 9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将商业养老保险纳入养老保障第三支柱加快建设”。2022 年 10 月 26 日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2〕7 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印发了《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大众也逐渐将目光转向商业养老保险，认为商业养老保险能够有效应对人口的快速老龄化、满足人民群众养老需求的日益多样化以及增强养老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

甘肃位于中国西北地区，经济欠发达，人口流出较为严重，历年老龄化排名靠前，根据 2017-2021 年甘肃省统计年鉴，15-64 岁劳动人口数量由 2017 年的 1880.53 万人逐年减少至 2021 年 1688.02 万人，65 岁以上老年人口由 2017 年的 286.73 万人逐年增加至 2021 年的 325 万人，老年人口抚养比由 2017 年的 15.25% 上升至 2021 年的 19.25%，

最新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末，60 岁及以上人口占甘肃省常住人口总数的 17.03%，超国际老龄化标准 7.03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上人口占甘肃省常住人口总数的 12.58%，超国际老龄化标准 5.58 个百分点，这表明甘肃省已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随着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家庭养老压力加大、政府财政支出负担加重、年轻劳动力的供给减少以及生产力下降等诸多问题，社会问题日渐突出，影响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面对不断加剧的养老负担，甘肃省必须深化商业养老保险发展，发挥商业养老保险经济给付和补充险的作用，促进甘肃省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1.1.2 研究目的

本文基于目前我国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大背景，聚焦甘肃省日趋严峻的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其所产生的社会问题，结合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现状进行研究，分析出目前甘肃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确定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影响因素，以达到为深化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提供可行性和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促进甘肃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1.1.3 研究意义

研究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甘肃商业养老保险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1) 理论意义

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由“三大支柱”构成：第一支柱是由政府主导并负责管理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支柱是政府倡导由企业自主发展的职业年金和企业年金；第三支柱是个人养老保险金制度，包括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目前我国第一支柱“一枝独大”，第二支柱发展缓慢，覆盖面不足，第三支柱发展薄弱，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日益加剧，第一、第二支柱显然已无法满足国民多样化的养老需求，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尤其是商业养老保险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广大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研究方法对养老保险体系进行深刻地论述，并对养老保险体系的构成、发展概况等都有了深入的研究，但是针对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研究分析稍有欠缺，现有文献大多数也是关于国家层面的宏观性研究和家庭层面的微观性研究，针对中观层面的地方性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研究少之又少，本文通过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如何深化甘肃商业养老保险发展进行研

究,对商业养老保险影响因素研究以及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研究有一定的补充作用,也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2) 现实意义

首先,长期以来甘肃省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处于落后水平,年轻劳动力人口不断流失,老年人口快速增加,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其次,甘肃省地处西北,有着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使得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结构性矛盾,尤其是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水平较其他省份差距较大。因此,本文通过分析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现状及影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深化甘肃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提供可行性和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减轻家庭养老负担和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缓解社会矛盾,并为西北地区其它省份的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提供借鉴。最后,把养老问题与市场运营有机结合,可以更好地发挥市场的自动调控功能,不仅能够有效地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还可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推动甘肃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1.2 文献综述

通过阅读大量的国内外文献,针对本次课题,本人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所读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分别为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人口老龄化与商业养老保险关系、商业养老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以及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

1.2.1 国外研究文献

①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研究

Anderson 和 Hussey (2000) 通过研究美国、日本、德国等 8 个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构成以及居民收入的影响,发现人口老龄化会提升劳动力成本、降低居民收入以及抑制经济增长^[1]。Faruqee (2002) 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可以从两方面体现,分别是改变消费以及储蓄倾向产生的需求效应和劳动力供应变化产生的供给侧效应^[2]。Faruqee 和 Tamirisa (2006) 通过对捷克共和国的相关数据进行动态世代重叠模拟,根据模拟结果发现人口老龄化在一定程度上对生活水平以及经济增长存在抑制作用^[3]。

②人口老龄化与商业养老保险关系研究

人口老龄化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关系研究主要是通过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的关系、商业养老保险与养老保险的关系来研究的。

国外学者研究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之间的相互关系,主要是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来研究的:一是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有哪些影响,二是如何去应对人口老龄化产生的负面影响。Showers (1994)通过研究美国人口老龄化的数据,发现收入和年龄对人们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4]。Li 和 Moshirian 等(2007)通过 GMM 估计研究 OECD 国家寿险需求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收入、受抚养人数以及受教育水平对保险需求具有正向影响,而预期寿命以及社会化保障支出对保险需求具有负向影响^[5]。Li 和 Lv 等(2020)通过 Probit 模型研究发现老年抚养比的提高会抑制商业养老保险需求^[6]。国外学者还探讨了商业养老保险与养老保险的关系, Townley Peter G C 等(1988)认为基本养老保险对商业养老保险具有挤出效应,国家建立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会降低老年人对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7]; Vicente (2019)在对私营养老与社会养老关系的研究中,得出保障制度会给居民存款与离休决策产生重大影响^[8]。

③商业养老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研究

Stanley (1973)在分析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度的影响因素中指出,收入的不稳定性是居民参加寿险的核心影响因素^[9]; Truett 等(1990)通过研究美国、墨西哥的经验数据得出,年龄、收入水平以及教育水平是影响寿险需求的主要因素^[10]; Browne 和 Kim (1993)认为收入水平、抚养比和社会保障支出对保险需求具有正相关影响,而通胀预期和保险价格对保险需求具有负相关影响,并且发现居民的风险意识是影响居民是否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关键因素^[11]。Beck 和 Webb (2003)利用 68 个经济体四十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分析得出通货膨胀、人均收入水平、银行的发展、宗教以及部门指标等宏观数据都是人寿保险在不同国家区域之间存在广泛差异的重要解释因素^[12]。

④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研究

Clara Busana Banterle(2002)通过行为方法研究,认为个税递延对投保人和保险计划发起人(主要指保险人)具有激励作用并且能够促进养老保险发展^[13]; John Creedy 等(2008)指出,个税递延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有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意义,不仅能增加社会储蓄,而且有助于增加社会福利,推动代际公平,同时对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均有积极影响^[14]; Heim 和 Lurie (2014)通过税收收入数据发现,由于税优激励程度较高,较高收入人群都有很强的参保意愿,且保费支出也更高,从中获益也更多,但是,如果能够对低收入群体进行适当的政策倾斜,则低收入群体的参与率也会得到提高^[15]; Vanya Horneff、Raimond Maurer、Olivia S. Mitchell (2020)通过对税延养老保险的投资进行福利分析,发现对退休人员 401(k) 资产账户进行适度的投资处理,可

使其收益提高至计划金额的 20%，能够有效地提高退休保障，这种方式也是扩大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一种有吸引力的方式^[16]。

1.2.2 国内研究文献

①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研究

我国学者在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却提出了许多符合我国实际发展情况的针对性观点，主要研究集中于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认为人口老龄化加剧会减少年轻劳动力数量、增加家庭养老负担以及加大政府财政支出压力等诸多问题，进而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对劳动力影响方面，张秋（2018）认为人口老龄化加剧，既会影响劳动力市场就业人口的总量，也会对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结构、流动性以及参与率产生影响，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17]。呼倩（2019）利用中国 1987—2017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人口老龄化的劳动供给效应，研究得出人口老龄化程度每加深 1%，潜在劳动供给和真实劳动供给下降约 2%，经济活动人口劳动参与率下降 1.2%^[18]。宋佳莹、高传胜（2022）将人口老龄化引入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的主要机制为，当人口老龄化跨越阈值时，劳动力供给数量、人力资本水平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边际正效应均呈现递减趋势，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19]。

在对家庭的影响方面，李昊（2021）利用 2012—2016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老龄化显著降低了我国家庭总教育支出和非义务教育支出的水平，我国居民家庭中存在“老年人口增加—医疗负担加重—家庭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受到不利影响”的现象^[20]。张佩茹（2022）基于调查数据，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实证研究，得出老年人口数量越多，养老保障支出对核心消费的挤出效应越强，而对边际消费的挤出效应越不明显^[21]。陈武元、陈名灏等（2023）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及省级层面数据，运用多元有序回归分析、中介效应检验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地区老龄化的加深通过结构性就业问题和父母养老策略的中介效应，最终减少了家庭收入，增加了家庭养老负担^[22]。

在对政府的影响方面，朱德云、王素芬（2021）选取 2008—2018 年全国 30 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人口老龄化对地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影响，结果表明：（1）人口老龄化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为支出增加型而非收入减少型；（2）人口老龄化对地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存在不利影响^[23]。竹志

奇等(2022)构建了一个含有财政“四本账”的债务风险模型,通过模型得出人口老龄化作用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主要机制有宏观税率机制、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劳动力供给机制、社会投资机制、公共服务支出机制、公共投资支出机制、社会保险收入机制和社会保险支出机制,主要集中于一般公共预算与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两本账”^[24]。龙腾、王海军(2023)用1990~2019年全球72个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人口老龄化对主权债务风险的影响机理,发现人口老龄化会加重政府公共支出负担,并通过多种渠道助推主权债务风险,最终影响经济长期增长^[25]。

②人口老龄化与商业养老保险关系研究

人口老龄化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关系研究主要是通过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的关系、商业养老保险与养老保险的关系来研究的。

国内学者关于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的影响和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这两方面。在对养老保险的影响方面,薛玮、赵媛(2019)基于消费理论,结合我国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现状以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发展,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得出人口老龄化会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对居民消费有负效应^[26]。齐红倩、杨燕(2020)通过构建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来研究平均替代率对累计结余率变动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平均替代率对累计结余率具有负向非线性影响,当老龄化水平高于门槛值(10.63%)时,平均替代率的提升会使得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的消耗加速;平均替代率对累计结余率的负向影响强度和各地区的老龄化水平有着正相关关系^[27]。汪伟、靳文惠(2022)通过构建世代交叠模型分析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发现,在人口老龄化冲击下,养老保险制度对总体收入分配的正向调节作用将被弱化^[28]。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方面,张燕婷、董克用等(2020)认为要统筹推进养老金制度改革和参量改革,为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29]。王晓洁等(2021)从人口老龄化对财政税收影响的视角出发,认为我国要适应人口老龄化时代的税基变化适时开征零售税和房地产税,实施有利于提升劳动力供给的税收政策,实施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税收政策,扩大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范围,实施支撑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的税收政策^[30]。胡显海、蒋若凡(2022)基于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认为应该从完善生育配套政策、着力提高人口素质、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夯实养老财富储备、大力发展老龄产业、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等方面探寻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具体对策^[31]。

关于商业养老保险与养老保险关系研究,国内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都是集中于商业养

老保险在我国保障体系中的定位、商业养老保险和社会养老保险的协调发展以及基本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的相互影响方面。在商业养老保险在我国保障体系中的定位方面,周延礼(2022)认为现阶段,我国加速进入老龄社会,养老保险第三支柱是我国养老保障体系亟待补齐的短板,而商业养老保险作为养老保险第三支柱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养老保险能够有效应对人口的快速老龄化、满足人民群众养老需求的日益多样化以及增强养老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32]。孙洁(2022)也认为随着我国长寿时代加速到来,养老金第三支柱发展亟待提速,必须加快以个人商业养老保险为代表的养老金第三支柱发展^[33]。在商业养老保险和社会养老保险的协调发展方面,范林(2018)认为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发展不平衡,存在着明显的短板,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一枝独大”,而商业养老保险发展薄弱,参与度偏低,推进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发展的同时应该注重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相互补充,协调发展^[34]。王贞琼(2021)也认为现有的“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存在着基本养老保险“一支独大”,补充养老保险与个人养老金制度发展滞后,商业保险的功能定位不明晰、机制运用不充分,多层次的养老体系不健全等问题,难以应对老龄化风险,推动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协同发展,发挥商业保险的专业优势和市场机制,使商业养老保险成为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35]。在基本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的相互影响方面,张细松等(2019)运用 Granger 因果关系、JJ 协整与 VEC 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他们之间的长期和短期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收入、支出与我国商业寿险保费收入、业务给付之间分别存在相互影响;我国商业寿险保费收入与基本养老保险收入、支出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并受到其滞后期的影响,因此,要构建多支柱养老金体系,完善基本养老保险管理制度,健全商业养老保险与基本养老保险之间的互联机制^[36]。贺潇霄(2022)根据 2013、2015 年以及 2018 年的 CHARLS 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以及双重差分法研究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与商业养老保险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城乡居民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开始会促进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但后期却存在挤出的作用,因此建议完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立法并加强监管^[37]。

③商业养老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研究

国内学者主要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研究商业养老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理论分析角度主要集中在相关税收优惠政策以及对第三支柱改革的政策性建议方面;实证分析角度主要集中在对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保情况的影响因素研究。理论分析层面:郑功成等(2019)指出目前我国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存在诸多问题,如实施的相应政策优惠效果不佳、法律保障覆盖面有限,因此需要从医疗、住房、老年服务等基础民生项目重点推

进政策建设^[38]。娄飞鹏等（2020）概括了我国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目前所取得的成效以及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认为首先需要明确整体改革方向，依据改革方向完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统筹管理、扩大职业年金的覆盖范围以及重点发展个人储蓄养老计划^[39]。温来成等（2021）通过研究总结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壮大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的国际经验，认为实施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对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的发展至关重要，应健全相关税收制度政策、加大税收优惠的力度以及加强对税收征管的监督，确保实施税收优惠的成效^[40]。实证分析层面：董艳华（2019）根据问卷调查数据发现潜在商业养老保险需求与实际参保情况存在明显偏差，通过二元 Logistic 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发现了对天津商业养老保险需求影响显著的因素，其中家庭的人均年收入、对保险公司以及保险保障水平的满意程度对天津商业养老保险需求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身体健康状况和居民对保险金额接受度对天津商业养老保险需求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41]。周海珍等（2020）通过利用有序多分类回归、OLS 回归以及 Probit 回归研究居民的金融素养对其养老准备和是否参加商业养老保险的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金融素养、教育水平、健康状况以及家庭年收入对其养老准备和商业养老保险决策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抚养孩子数对居民的商业养老保险决策具有负向影响^[42]。谢波峰等（2021）利用 Probit 模型和双重差分法对参保人保险行为的微观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年龄负向影响参保人退保概率，性别几乎不会影响投保人退保行为，研究还发现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投保人退保概率相对偏高^[43]。周林毅、刘婷婷（2022）利用福建省宁德市农村 669 位受访者问卷显示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显著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退休后靠子女养老、月所得、儿女数量自然对数、职业影响^[44]。

④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研究

国内学者关于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现状、问题以及路径上，最主要的探索是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和专属型商业养老保险。在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现状、问题以及路径方面，刘姝池（2021）借鉴美国、德国、瑞典在应对老龄化趋势中采取的商业养老保险改革措施的成功经验，认为我国应该从税优政策、金融资本市场、产品设计和个人养老账户这几方面发展商业养老保险^[45]。许捷（2023）认为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保险公司亟需在创新老年人群保险产品服务中寻求“突破”，发展与社会大众养老需求契合度高、符合生命周期特点的养老保险产品，切实发挥第三支柱作用，有效弥补高端客群、普惠客群、地区特殊人群、灵活就业人群等多元化、分层化的健康养老保障缺口^[46]。在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方面，赵振翔等（2021）

通过动态模拟的方法研究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对参保人的影响。研究表明：参保人参加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后，其退休后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研究还发现退休前收入越高、期望寿命越低的参保人，在其退休后商业养老保险收入提高越明显；且商业养老保险收入的增加女性是低于男性的^[47]。周华林等（2022）通过构建 EEE、EET 模式以及 EEE、EET 混合模式对试点期间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方案存在的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养老金替代率及税收优惠比例都相同的情况下，EEE、EET 混合模式方案覆盖人群最广，缴费压力最小，建议我国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方案采用 EEE、EET 混合模式^[48]。李鹏等（2023）利用养老金替代率等指标，构建养老保障水平测算模型，对我国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进行定量分析，政策调整模拟结果表明，提高缴费上限和领取年龄、降低领取税率有助于提升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因此，应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优化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发展方案，进一步扩大覆盖面，强化税收优惠的激励作用，持续推进我国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发展^[49]。属型商业养老保险方面，刘金霞（2022）指出专属商业养老保险发展中存在优惠力度不够、产品专属性不强和账户收益率不确定等问题，并从制定优惠政策、完善法律法规、创新服务模式、强化风险管理方面提出对策建议^[50]。汤阔淼（2023）认为专属商业养老保险是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而非替代，其特殊性表现在政策目的在私法自治的保险契约中的特别安排，具体包括政府引导取代商业自主、共保联营取代国家兜底、匹配缴费取代替代缴费、自动注册取代自愿储蓄、退保限制取代无法退保等规则，以此增强保险制度的强制性，减少保险制度的替代性，从而与个人养老金制度相区别^[51]。

1.2.3 文献评述

本文通过对前人文献的整理归纳发现，各国学者对人口老龄化、商业养老保险和养老保险制度方面的研究日益增多，但是大部分围绕国家层面的宏观性研究或者商业养老保险具体某方面的微观性研究，例如：国家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三支柱养老保险制度的联动性改革、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第三支柱的现状、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税优研究、专属型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研究等宏观性研究；人口结构、微观家庭层面对商业养老保险需求的影响、商业养老保险意愿及动机等微观性研究，宏观性和微观性研究内容丰富且成果突出。相比之下，对中观层面的地方性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的研究比较匮乏。纵观国内，对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研究少之又少，缺乏系统性的研究。

所以本文基于国内外现有研究，结合当前甘肃省老龄化日趋严重的背景，选取城镇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人均 GDP、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等六个因素对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需求进行实证分析，对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发展进行系统性研究，深化甘肃商业养老保险发展。

1.3 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1.3.1 研究思路

本文整体研究思路如图 1.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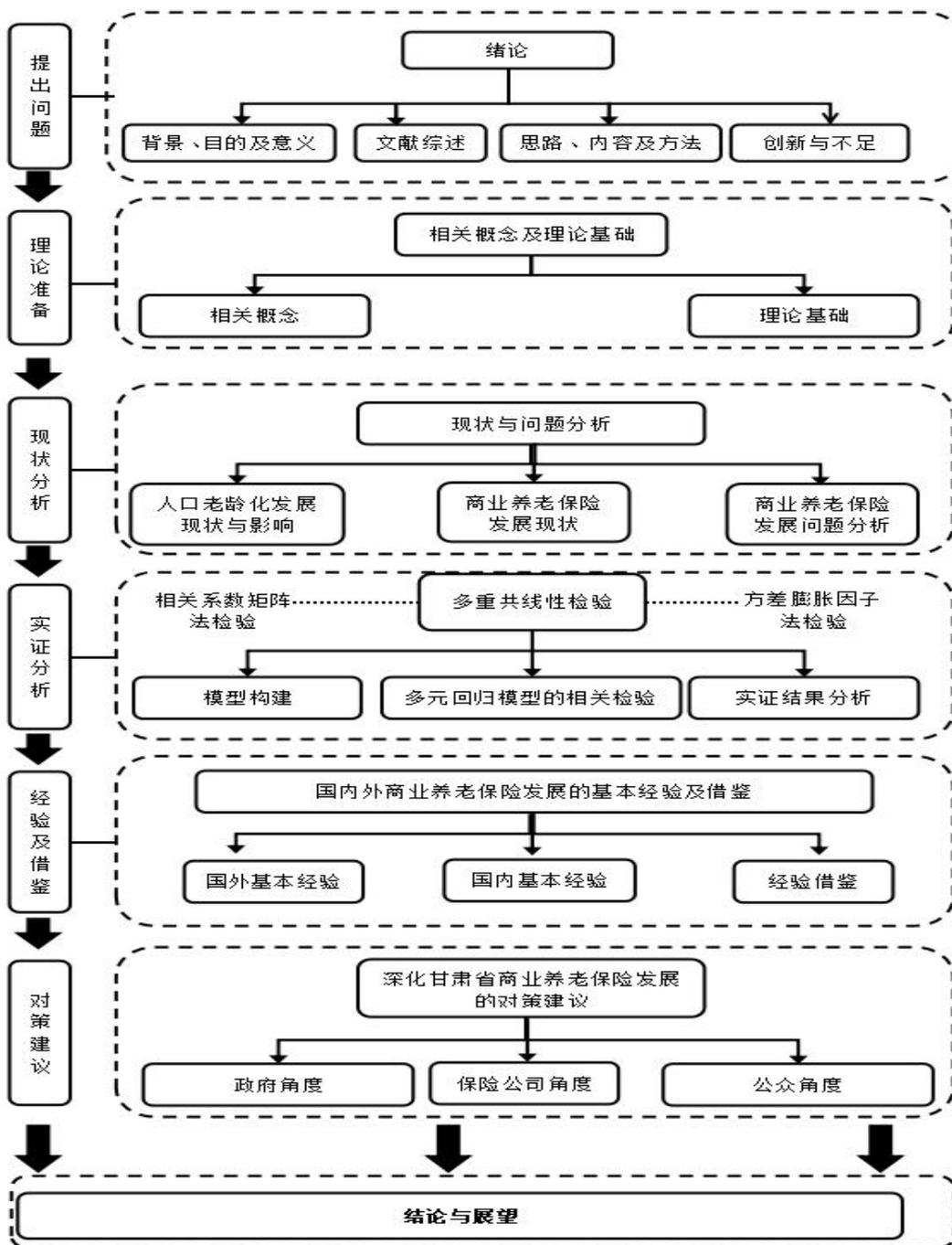


图1.1 思路框架

1.3.2 研究内容

全文共分七部分：

第一部分:绪论。简单概括了本文研究的背景、目的、意义、方法及思路，并对国内外有关人口老龄化以及商业养老保险的文献进行归纳梳理，也指出了本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第二部分: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主要阐述了人口老龄化、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和商业养老保险三个基本概念,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生命周期理论以及寿险需求理论三个基础理论,为本文后面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第三部分:甘肃省人口老龄化及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现状与问题分析。首先分析了甘肃省人口老龄化现状及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再重点分析了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需求状况、供给状况以及保费状况,找到目前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简而言之,利用数据可视化的方法将甘肃省人口老龄化现状进行数据化呈现,再综合甘肃省寿险市场数据,分析其养老保险供求以及保费状况,得出目前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第四部分: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首先从人口、经济、社会三个维度选取了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人均GDP、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教育支出以及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这六个影响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重要因子作为解释变量,然后选取保险密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对这六个因素对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需求的影响进行定性分析,最后结合2017-2021年甘肃省14个地级市相关的经济数据,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综合分析这六个因素对商业养老保险需求的影响情况,对定性分析进行定量的解释。

第五部分:国内外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基本经验及借鉴。主要介绍了美国、德国、日本相关的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案例以及上海发展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和重庆专属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经验,借鉴国内外科学的经验,深化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发展。

第六部分:深化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对策建议。结合前面的现状、问题以及实证分析,从政府、保险公司和公众三个层面为深化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第七章:结论与研究展望。通过现状和实证以及经验借鉴得出的研究结论,理论联系实际,具有一定的适用性,研究结论将有助于深化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

1.3.3 研究方法

(1) 文献梳理法

文献分析研究方法是论文写作的常用方法之一。围绕某一个问题,对其展开搜集并梳理相关文献,从而可以达到对该问题有着较为深入了解和认知。本文查阅了大量国内

外学者的研究文献，主要有关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以及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关系研究、商业养老保险发展以及其影响因素相关的文献，对这些文献进行梳理分析，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2）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本文第四章研究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影响因素中采用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对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人均 GDP、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教育支出以及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对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需求的影响给出假设，进行定性分析，然后利用甘肃省 2017-2021 年 14 个地级市相关人口、社会、经济数据，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需求因素，做出定量的解释。

（3）比较分析法

由于人文地理历史环境不同，不同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存在差异，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养老保险制度也有所变化，本文第五章介绍了美国、日本、德国发展商业养老保险的成功案例以及国内上海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和重庆专属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经验，并进行了对比分析，为深化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1.4 创新点与不足

1.4.1 创新点

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商业养老保险的研究大部分都是围绕国家层面的宏观性研究或者是家庭层面的微观性研究，例如：我国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的现状、我国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税优研究、我国专属型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研究等宏观性研究；人口结构、微观家庭层面对商业养老保险需求的影响、商业养老保险意愿及动机等微观性研究。相比之下，对中观层面的地方性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的研究比较匮乏，尤其对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研究少之又少，缺乏系统性的研究。

本文是基于国内目前人口老龄化严峻的形势，聚焦甘肃省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结合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现状分析出目前甘肃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最后综合考虑人口、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利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为甘肃商业养老保险的进一步发展提出政策建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中观层面上地方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研究。

1.4.2 不足

一是由于个人知识水平限制，本文专业知识在与保险学相关理论知识结合程度上存在一定欠缺，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深度；二是由于数据资料搜寻困难，通过整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甘肃历年统计年鉴、地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数据，构造截面数据，选取了最近 2017-2021 年的数据，在时间维度上不够长，可能对最后研究结果的适用性存在一定影响。

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

2.1.1 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指的是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增长的动态过程。由于生育率的下降以及人均寿命不断延长,使得总人口当中年轻劳动力人口数量不断减少,而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导致老年人口比例不断增长。人口老龄化包含两层含义,即老年人口相对年轻劳动力人口不断增多,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以及社会人口结构呈一种老年状态,迈入老龄化社会。

根据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当中划分的标准可知,当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当中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 10%,或者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 7%,那么就表明这个国家或地区迈入了老龄化社会。以此为标准,在 2001 年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就超过了 7%,跨入了老龄化国家的行列,步入老龄社会,而以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数据为参考,此指标从 2002 年的 7.3% 上涨至 2012 年的 9.4%,2012 年我国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到 1.27 亿人,且每年仍以 800 万人的速度增加,人口老龄化问题不容乐观,有关专家预计,到 2050 年,我国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一。

2.1.2 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是由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一,为老年人提供经济保障和生活保障。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初衷是减轻老年人经济负担,保障他们基本的生活需求和权益。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由三大支柱组成,分别是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以及个人储蓄型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

基本养老保险是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最主要的一部分,也是第一支柱,是老年人最主要的保障来源。基本养老保险分为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农村居民养老保险两种。在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中,所有在城镇工作的人必须缴纳养老保险,其费用由用人单位和个人按比例分担。在农村居民养老保险中,政府设立了养老保险基金,资助那些不能承担全部

养老保险费用的老年人。基本养老保险能够提供老年人基本的退休金、医疗保障和残疾保障，并且为各种情况下的风险提供经济补偿。这一支柱主要满足退休后的基本养老需求，但保障水平相对较低。目前，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已经达到90%以上，为广大老年人提供了最基本的养老生活保障。

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是第二支柱，它属于补充型养老保险，由国家引导、政府行政监督、单位和职工基于市场行为选择性参与，与基本养老保险不同的是，企业年金的管理完全由企业自行承担，其主要面向的是公共和私营企业的员工，企业年金的建立不仅可以提高员工的福利待遇，还可以为企业提供员工的长期留任和激励机制。企业年金的缴费主要由雇主和员工按照比例缴纳，缴费后可以获得企业年金发放的权益。这一支柱旨在满足退休后的较高层次养老需求，但是覆盖范围小，目前中国的企业年金已经全面推行。

个人储蓄型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是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第三支柱。个人储蓄型养老保险建立在基本养老保险系统基础之上，实行个人储蓄账户分账制度。工作人员的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一般在一定范围内由个人和单位各自承担，每个人的养老账户会累积该人的个人养老保险缴费、利息、补充缴费等各项权益，最终通过统一的个人储蓄账户获得养老保险待遇。商业养老保险是指无政府参与、由个人自行从保险公司购买的养老保险产品，目前主要包括传统商业养老险、税延型养老保险和专属商业养老保险。由于商业保险产品的多样化和自行决策，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选择不同的产品搭配以及领取年限，自由度较高。这一支柱是由个人自愿参加的，主要是通过个人储蓄和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来满足更高的养老需求。目前第三支柱在养老保险体系中是短板，但是第三支柱可以弥补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的不足，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对于养老保险的可持续性和资金大量积聚，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推动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建设迫在眉睫。

总的来说，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是一个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的系统，其中第一支柱是基础，第二支柱是补充，第三支柱则是重要补充。这个体系能够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群体的养老需求，有助于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目标。

2.1.3 商业养老保险

(1) 商业养老保险的定义

商业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保险的重要补充。它是一种

由保险公司经营的，以盈利为目的的养老保险产品，商业养老保险的保护对象是投保人的个人身体、生命，投保人在参保时需要签订合同，在约定期限之前或者退休之前定期向保险公司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用，在约定期限到达之后或者投保人退休的时候，保险公司会定期向投保人支付一定数额的养老金，满足参保人的养老需求。商业养老保险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投保自愿，即商业养老保险的参与者必须是自愿的，这是与强制性社会保险的一个重要区别，投保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购买养老保险，以及选择购买何种类型的养老保险；二是合同约束，即商业养老保险通常以合同的形式存在，合同规定了保险公司和投保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投保人必须遵守合同的规定，而保险公司则必须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养老金；三是风险自负，即在商业养老保险中，投保人需要自己承担投资风险，保险公司只是按照合同约定提供养老金支付服务，并不保证投资收益；四是长期投资，即商业养老保险通常需要长期的资金投入，以积累足够的养老金；五是保险费用高，即商业养老保险的保费通常较高，这是因为保险公司需要承担投资风险和养老金支付等成本；六是养老金增值，除了支付养老金外，商业养老保险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其具有增值功能，即投保人的养老金可以在投资中获得一定的收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御通货膨胀的影响；七是税务优惠，在一些国家，政府会给予商业养老保险一些税务优惠，以鼓励人们购买商业养老保险。这些优惠可能包括减免保费税、减免养老金税等。

(2) 商业养老保险的分类

商业养老保险有多种类型，以下是其中几种常见的类型：一是传统型养老保险，传统型养老保险是最常见的类型之一，它主要提供固定的养老金支付。这种类型的保险通常不涉及投资，只提供固定的养老金，因此风险较低；二是分红型养老保险，分红型养老保险将一部分保费投资到股票、债券等投资品种中，并将投资收益分配给投保人。这种类型的保险风险较高，但收益也较高；三是万能型养老保险，万能型养老保险是一种综合性的养老保险产品，它结合了传统型和分红型的特点。它提供固定的养老金支付，并将一部分保费投资到股票、债券等投资品种中。这种类型的保险风险和收益都相对较高；四是投资型养老保险，投资型养老保险是一种以投资为主要目的的养老保险产品。它通常将全部保费投资到股票、债券等投资品种中，并将投资收益作为养老金支付给投保人。这种类型的保险风险较高，但收益也较高。

2.2 理论基础

2.2.1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是于 1943 年被正式提出，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是多样化、多层次的，既有先天需求，又有后天需求，越是基本的需求就越低级，越与动物相似；越为人类所特有的需求就越高级，他将人的需求划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实现需求，而且这些需求都是按照顺序出现的，需求层级逐渐升高。当一个人最低级的需求被满足后，就会出现更高级的需求，各种需要依层级从低到高出现。

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隶属于生理需求范畴，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满足的是老年人最基本的需求，维持个体生存，如果老年人退休后追求高质量生活，比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实现需求，此时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是无法满足的，这就需要建立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来满足老年人不同级别的养老需求，商业养老保险是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有效补充，不仅可以满足老年人最基本的生活，还可以为老年人提供更多实现自我的机会。

2.2.2 生命周期理论

生命周期理论是由莫迪利安尼和布伦贝格提出，主张人的一生可以分为青年、中年和老年三个阶段。该理论主要内容是居民如何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分配消费与储蓄。具体而言，在青年时期居民的收入比较低，但通常会借贷行为进行超前消费，这样储蓄就会减少甚至出现负储蓄；在中年时期，随着工作经验的增加以及人力资本的积累，居民收入会大幅上升并达到峰值，这时居民收入是高于消费的，因而储蓄会大幅增加；在老年时期，居民退休后，收入会出现大幅下降，但医疗费用等支出会快速增加，使得中年时期积累的储蓄不断消耗，储蓄不断下降。

生命周期理论除了分析个体的消费与储蓄问题外，还分析了整个社会的储蓄率问题，不同年龄段人数的占比情况对总消费和总储蓄有直接的影响。例如，在整个社会中，当年轻人和老年人比例大时，社会的消费倾向高，储蓄率会维持在较低水平；当中年人比例大时，社会的储蓄倾向高，储蓄率就会维持在较高水平。

生命周期理论还具有引申含义，即个体可以通过社会保障等项目提升退休阶段的储

蓄率，而这正好与年金型商业养老保险的特性相契合，个体通过参加年金型商业养老保险，在工作时期定期支出保费，退休后就可以领取保险金，从而保障退休后的消费水平。

2.2.3 寿险需求理论

寿险需求理论是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发展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生命周期的阶段性会影响人们的消费，但除此之外，生命长度对人们的消费也会产生较大影响，这是由于生命的不确定性所致，而人寿保险恰恰可以转移这种不确定性，人们购买人寿保险正是在为了消减这种不确定性。寿险需求的影响因素是指在一定情况下能够影响居民自愿且有能力购买人寿保险产品的因素总和。

商业养老保险隶属于寿险，商业养老保险是一种基于市场行为的产品，其有效需求即在特定的价格范围之内，消费者自愿购买且有能力的数量。这种有效需求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消费者自愿购买，二是消费者能够购买。自愿购买表明消费者具有风险意识，认为通过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可以使其退休后的生活质量不会大幅下降，保障其最基本的生活和满足其更高级别的需求，认同商业养老保险存在的价值，这和消费者自身受教育水平、保险机构和政府部门的宣传以及社会整体保障水平息息相关；能够购买反映的是消费者的购买能力，这和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物价水平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52]。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通过综合分析后认为从需求侧分为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三大因素。

人口因素

(1) 人口数量

养老保险产品是围绕的主体是人，其主要目标是满足人的养老需求和其它多样化需要，人口规模越大，则对养老保险的需求就越大。

(2) 人口结构

随着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加剧，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老年人口数量越来越多，因此养老需求也随之增加。一方面，因为不同区域城市化水平不同，导致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比例不同，而城镇居民的生活收入水平以及风险保障意识明显高于农村居民，所以城镇居民对养老保险的需求会高于农村居民；另一方面，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人群，因为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其大多数人对商业养老保险的心理需求程度会有所下降，都是以商业养老保险为补充，因此这部分人群会减少对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52]。

经济因素

(1) 经济发展水平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商业养老保险的有效需求。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教育的投入就会增加,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以及风险保障意识也会相应提高,进而影响商业养老保险的有效需求。

(2) 收入水平

个体的收入水平也会影响对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高收入群体通常更有能力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因为他们更能够承担保费,并希望在退休时保证更高质量的生活,而低收入群体可能会依赖社会福利制度或其他资源。

(3) 利率和通货膨胀率

利率和通胀率是影响商业养老保险价格和收益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当市场利率维持在较高水平时,人们的储蓄倾向会高于消费倾向,从而降低对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通胀率上升则会导致养老金的实际购买力下降,从而影响投保人的实际收益,进而影响到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53]。

社会因素

(1) 教育水平和保险意识

教育水平和保险意识也会影响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受过较高教育的人通常不仅更加了解保险市场情况和社会现状,而且眼光长远,具有很强的风险意识,因此相对而言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意向会更强,更有可能购买商业养老保险。

(2) 社会保障水平

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双向影响商业养老保险需求。一方面,社会保障对商业养老保险会产生替代效应,尤其是高福利社会,国家提供的养老金水平高,居民不用担心退休后的生活,对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不高,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社会保障制度会制约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另一方面,如果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福利待遇水平比较高,从而在保障目前生活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居民其实会更倾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来实现自身的多样化需求,在某种程度上会促进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

3 甘肃省人口老龄化及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3.1 甘肃省人口老龄化现状与影响

3.1.1 人口老龄化现状

随着甘肃省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二胎政策的实施，医疗技术有了巨大进步，人们生育观念也发生了巨大转变，死亡率和生育率持续下降，进而导致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转变，适龄劳动人口持续减少，老年人口持续增加，人口老龄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首先是劳动力规模持续萎缩，由表 3.1 可以看出，甘肃省 15-64 岁人口由 2014 年的 1928.68 万人逐年减少至 2019 年的 1878.88 万人，呈逐年递减趋势，而截止 2020 年，甘肃省 15-64 岁人口直接减少为 1701.19 万人，一年时间减少将近 180 万人，下降幅度巨大；其次是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持续增加，由表 3.1 可以看出，甘肃省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由 2014 年的 221.51 万人逐年增加至 2021 年的 325 万人，呈上升趋势，老年人口规模越来越大；最后是人口老龄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根据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当中划分的标准可知，一般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 7%(60 岁及以上超过 10%)作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志，将达到 14%作为进入老龄社会的标志，达到 20%作为进入超老龄社会的标志^[54]，而甘肃省早在 2007 年之前就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最新的 2022 年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示的数据，截至 2022 年末，全省常住人口 2492.42 万人，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334.98 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 13.44%，超国际化标准 6.44 个百分点，即将达到 14%进入老龄社会，这表明甘肃省已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

表 3.1 2014-2020 年甘肃省人口年龄结构分布

年份	0-14 岁人口 (万人)	15-64 岁人口 (万人)	65 岁及以上人口 (万人)
2014	440.59	1928.68	221.51
2015	455.85	1888.16	255.54
2016	455.18	1884.12	270.65
2017	458.45	1880.53	286.73
2018	461.26	1879.05	296.95

续表 3.1

年份	0-14 岁人口 (万人)	15-64 岁人口 (万人)	65 岁及以上人口 (万人)
2019	461.18	1878.88	307.37
2020	485.2	1701.19	314.63

注：2014-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3.1.2 社会影响

人口老龄化是指人口生育率降低和人均寿命延长,使得总人口当中年轻劳动力人口数量不断减少,而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老年人口比例不断增长的动态。人口老龄化现象虽不像通货膨胀和经济变动那样周期短、变化急速,但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冲击却很大,因为它关系到社会的投资、生产、流通、分配、就业机会、医疗制度及家庭的结构变化等一系列涉及经济结构及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55]。

首先,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力人口相对减少,消费人口相对增加,从而加重整个社会的负担。由表 3.2 可以看出,2012-2021 年最近十年,65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呈逐年递增的趋势,老年人口持续增加,总抚养比和老年人口抚养比也呈上升趋势,而 2021 年甘肃省的总抚养比是 47.51%,简单而言就是每 100 名劳动人口必须要承担 47.51 名非劳动人口的抚养任务,社会负担越来越重;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情况来看,从 1995~2021 年,甘肃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增长了 170 倍,从 4.32 亿元增加至 733.41 亿元,增加幅度巨大,而截止 2021 年甘肃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仅为 378.1 亿元,政府财政也越来越重。

表 3.2 2012-2021 年甘肃省 65 岁及以上人口、总抚养比以及老年人口抚养比情况

年份	65 岁及以上人口 (万人)	总抚养比 (%)	老年人口抚养比 (%)
2012	216.77	34.54	11.31
2013	219.56	34.37	11.43
2014	221.51	34.33	11.49
2015	255.54	37.68	13.53
2016	270.65	38.52	14.36
2017	286.73	39.63	15.25
2018	296.95	40.35	15.8.00
2019	307.37	40.90	16.36

续表 3.2

年份	65 岁及以上人口（万人）	总抚养比（%）	老年人口抚养比（%）
2020	314.63	47.02	18.49
2021	325.00	47.51	19.25

注：2012-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其次人口老龄化会改变劳动力供给结构，使经济运营成本迅速增加，人们的储蓄意愿和资本积累逐渐降低，进而直接影响金融市场稳定和实体经济发展活力，加大经济下行压力^[56]。根据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受到多种因素共同影响，资本、技术和劳动力被称为当代生产力的三大要素，共同决定经济的发展，其中资本和劳动力是最主要的投入要素。一方面，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处于工作状态的劳动者具有较强的储蓄动机，劳动力人口的比重上升会增加储蓄率，人口老龄化使得劳动力人口比重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民总收入降低，居民的储蓄水平将随之下降，导致资本积累和资本投入的降低，进而影响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会降低社会总体的劳动参与率，使得劳动力市场中的适龄劳动力人口数量相对减少，而且劳动力结构也会逐渐老龄化，根据人口转变理论，老年型人口结构的劳动效率低于成年型的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必然会降低劳动生产率，经济产出也会受损^[57]，而且随着劳动力规模的萎缩，劳动力成本会上升，中小企业经济运营成本会迅速增加，同时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用工短缺，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加大经济下行压力。

3.2 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现状

3.2.1 需求状况

本文将从老龄化状况变化的角度入手，选取老年人口数量、抚养比以及平均预期寿命作为衡量指标来分析近年来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状况，鉴于数据的可用性，选择了甘肃省 2017-2021 年相应指标的经济数据进行计算与处理，具体分析如下：

（1）老年人口数量

一个地区人口老龄化现状最为直观反映就是当地老年人口数量的变化情况，而商业养老保险的服务对象正是老年群体，老年人口的数量变化直接能够反映出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状况。本文通过对 2017-2021 年甘肃省近五年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据进行了整理与分析，整理结果如图 3.1 所示，2017-2021 年甘肃省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分

别为 286.73 万人, 296.95 万人, 307.37 万人, 314.62 万人以及 325 万人, 呈逐年上升趋势, 近 5 年增加近 39 万老年人口, 说明甘肃省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 对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也日益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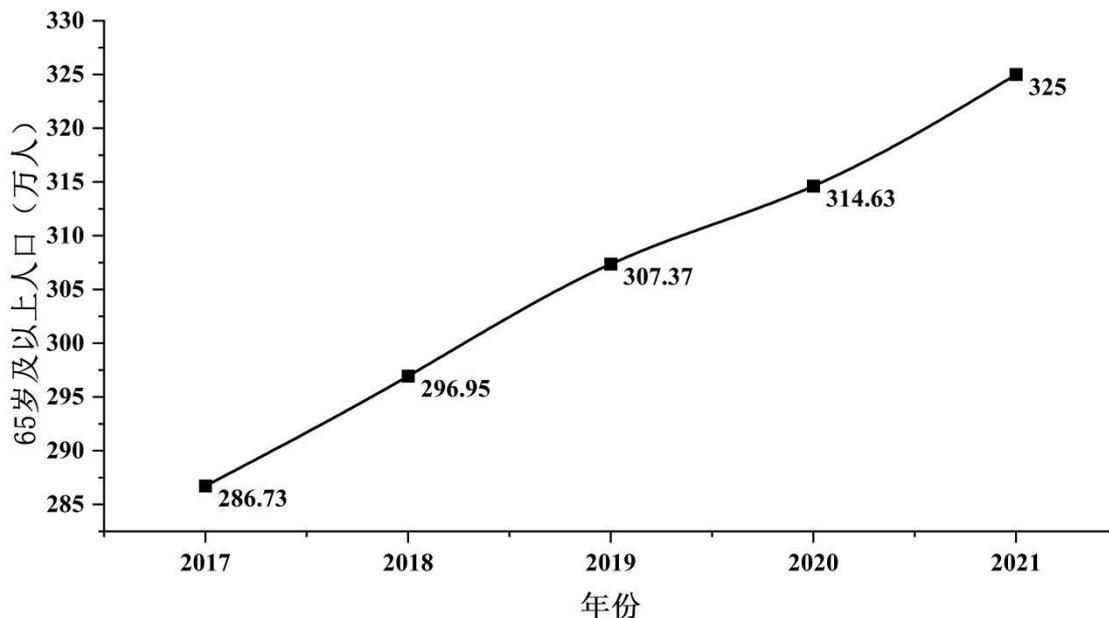


图3.1 2017-2021年甘肃省65岁及以上人口变化请情况 (数据来源: 甘肃省统计年鉴)

(2) 老年人口抚养比

人口抚养比又称抚养系数, 指的是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值, 公示表示为: $\text{总人口抚养比} = (\text{老年人口} + \text{未成年人口}) / \text{劳动年龄人口}$, 人口抚养比被各国政府用以衡量人口的年龄结构以及它们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而老年人口抚养比是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值, 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 直接含义是实际每百个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老年年龄人口。本文通过数据处理, 用折线图直观的描绘了甘肃省 2017-2021 年老年抚养比的变化情况, 如图 3.2 所示, 甘肃省老年人口抚养比分别为 15.25%、15.8%、16.36%、18.49%以及 19.25%, 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由 2017 年的 15.25% 上升至 2021 年的 19.25%, 上升达到 4 个百分点, 而老年人口抚养比直接度量的是劳动力的养老负担, 这表明甘肃省“人口红利”的经济效应不断减弱, 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负担不断加重, 这将会导致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不断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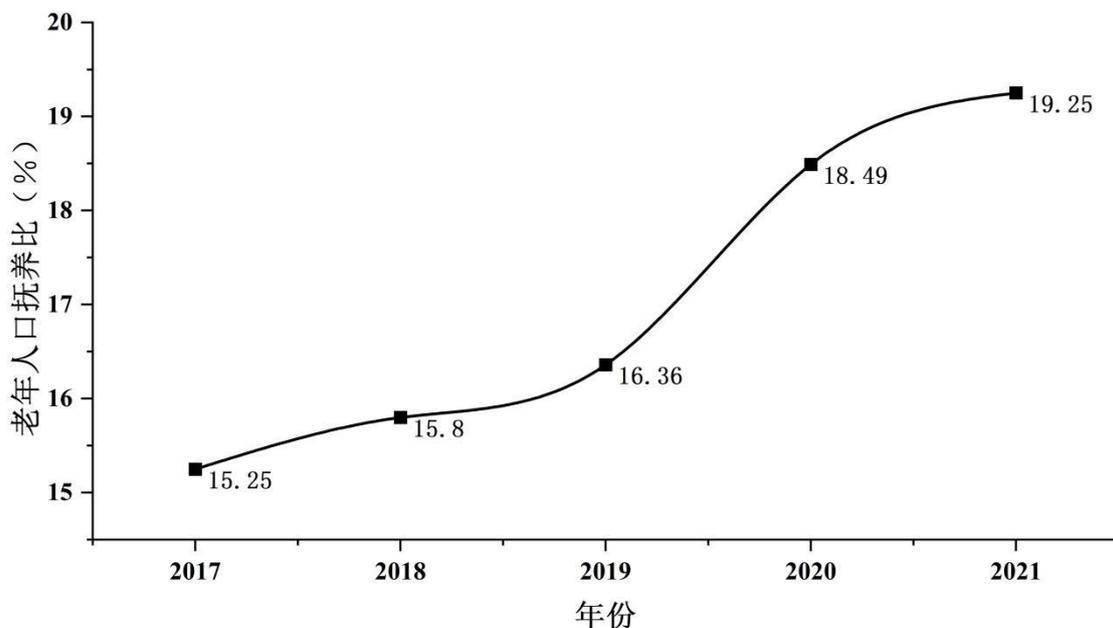


图3.2 2017-2021年甘肃省常住人口老年抚养比变化情况（数据来源：甘肃省统计年鉴）

（3）预期寿命

由于省市地区的居民预期寿命数据会有一些缺陷，鉴于数据的可用性和真实性，本文以甘肃省相关资料作为参照，使用近4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研究甘肃省居民平均预期寿命。人均寿命与社会经济发展、卫生技术条件等息息相关，并非固定不变的，一般而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医疗卫生技术不断进步，人均寿命也会不断提高。为了更为直观的反映人均预期寿命的变化情况，本文通过对近4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有关统计数据归纳整理，绘制了平均预期寿命折线图，从图3.3可以清晰直观的看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趋势，1990、2000、2010以及2020年我国人口预期平均寿命分别为68.55岁、71.40岁、74.83岁以及77.93岁，预期寿命不断增加，上升趋势明显。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一项最新调查，时至今日，中国的人均寿命已经上升至78.68岁，且预计今后五年内，人均寿命甚至还会增加1年，人均寿命的不断被延长，直接会使得老年人口占比上升，进而使得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不断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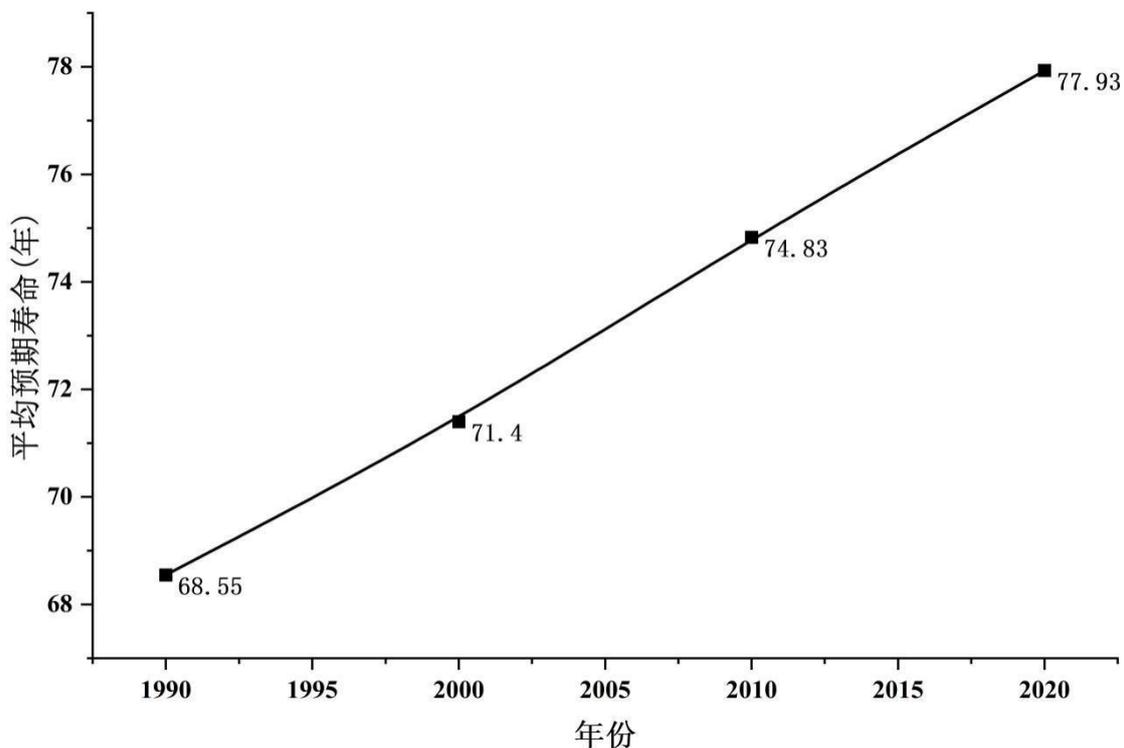


图3.3 1990、2000、2010以及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预期寿命（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3.2.2 供给状况

(1) 人寿保险公司数量

商业养老保险的经营主体是人寿保险公司，其数量可以直接反映出当地商业养老保险的供给状况。本文通过整理 2010-2020 年甘肃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绘制了甘肃省人寿保险公司数量变化的折线图（图 3.4），从折线图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 2010-2020 年甘肃省人寿保险公司数量呈上升趋势，在不断增加，从 2010 年的 22 家增加到 2020 年的 35 家，商业养老保险的提供主体越来越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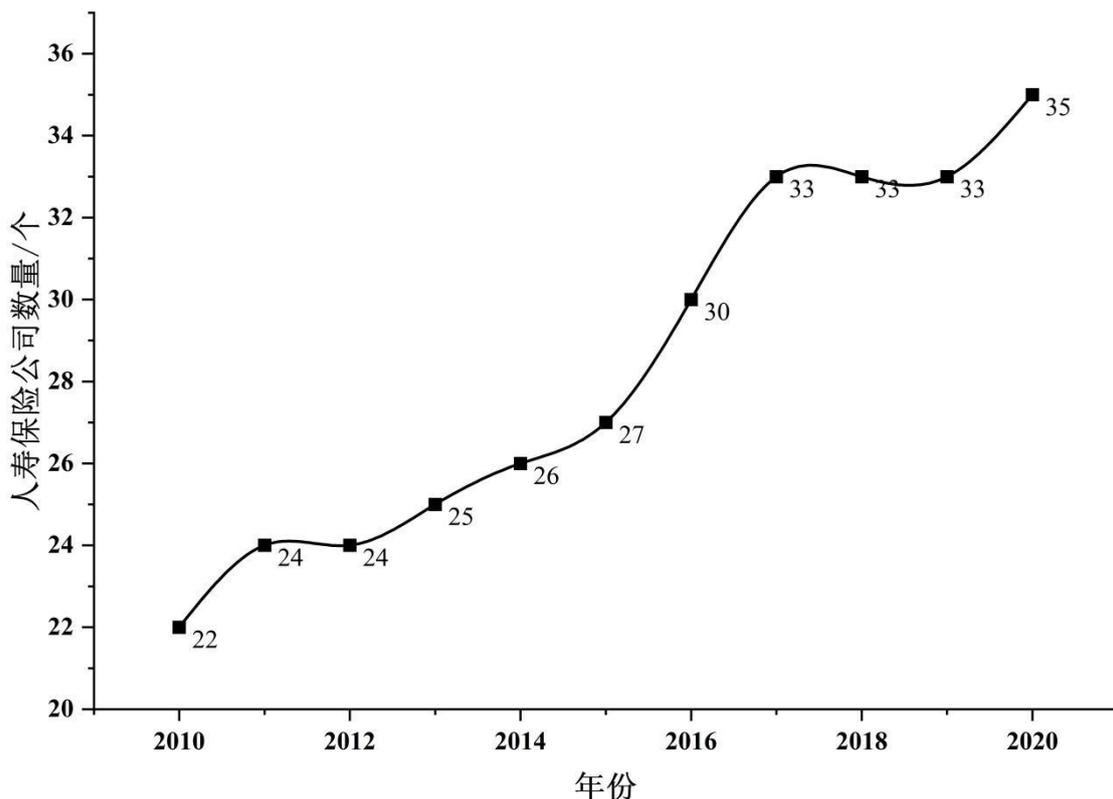


图3.4 2010-2020年甘肃省人寿保险公司数量（数据来源：甘肃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商业养老保险产品

近年来，我国商业养老保险市场发展迅速，各类养老保险产品层出不穷。目前，市场上主要有四大类型的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分别是传统型养老保险、分红型养老保险、万能型养老保险以及投资型养老保险。如表 3.3 所示，首先是传统型养老保险，它是最常见的类型之一，主要提供固定的养老金支付。这种类型的保险通常不涉及投资，只提供固定的养老金，因此风险较低；其次是分红型养老保险，分红型养老保险将一部分保费投资到股票、债券等投资品种中，并将投资收益分配给投保人。这种类型的保险风险较高，但收益也较高；然后是万能型养老保险，万能型养老保险是一种综合性的养老保险产品，它结合了传统型和分红型的特点。它提供固定的养老金支付，并将一部分保费投资到股票、债券等投资品种中。这种类型的保险风险和收益都相对较高；最后是投资型养老保险，投资型养老保险是一种以投资为主要目的养老保险产品。它通常将全部保费投资到股票、债券等投资品种中，并将投资收益作为养老金支付给投保人。这种类型的保险风险较高，但收益也较高。其中，传统型养老保险和分红型养老保险占据市场主导地位，但万能型养老保险和投资型养老保险等新型养老保险产品也逐渐受到消费者青睐。

表 3.3 主要商业养老保险产品

序号	保险名称	优点	缺点	适合人群
1	传统型养老保险	回报固定，风险低。	很难抵御通胀的影响。	适合年龄较大人群。
2	分红型养老保险	回报有下限，且与保险公司的业绩挂钩。	关联经营主体的经营状况，分红不确定	适合既要保障最低收益又要适度投资人群。
3	万能型养老保险	按月公布利率结算，复利增长，有保底利率，且账户透明，存取比较灵活，便于后期追加投资。	风险较大，一般承诺有 1.75-2.5%左右的保底收益。	适合理性投资理财者。
4	投资型养老保险	专业性和适用性强，转换灵活。	风险最高的险种，波动很大，高风险高收益型。	适合年轻人，风险承受能力强，以投资为主要目的的，兼顾养老。

3.2.3 保费状况

人寿保险保费收入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寿险业发展的核心经济指标，它的变动情况可以直观的反映当地寿险业发展状况。本文通过对甘肃省 2013-2021 年人寿保险保费收入数据进行整理，绘制了人身保险保费收入和同比增长变动情况的折线图（图 3.5）来分析甘肃省当前的商业养老保险保费发展状况，如图 3.5 中所示，从人身保险保费收入基数上看，2013 年甘肃省人身保险保费收入 11180.9 百万元，呈逐年递增趋势，至 2021 年人身保险保费收入高达 35932.7 百万元，增长了将近 2.2 倍；从同比增长率上看，甘肃省人身保险保费收入在 2015、2016 以及 2017 年度出现了增长高峰，同比增长分别为 29.70%、24.28%以及 22.71%，维持在较高水平，而在 2017 年之后，由于“最强监管”的到来，甘肃省人身保险保费收入增速出现大幅下降，2018 年同比增长直接降为 7.53%，之后每年增长率都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但增速始终为正，人身保险保费收入每年保持着绝对增长，从整体上看，甘肃省人寿市场仍处在高速发展的初期，老年人口不断增加，

因此，我们可以预见甘肃省的寿险市场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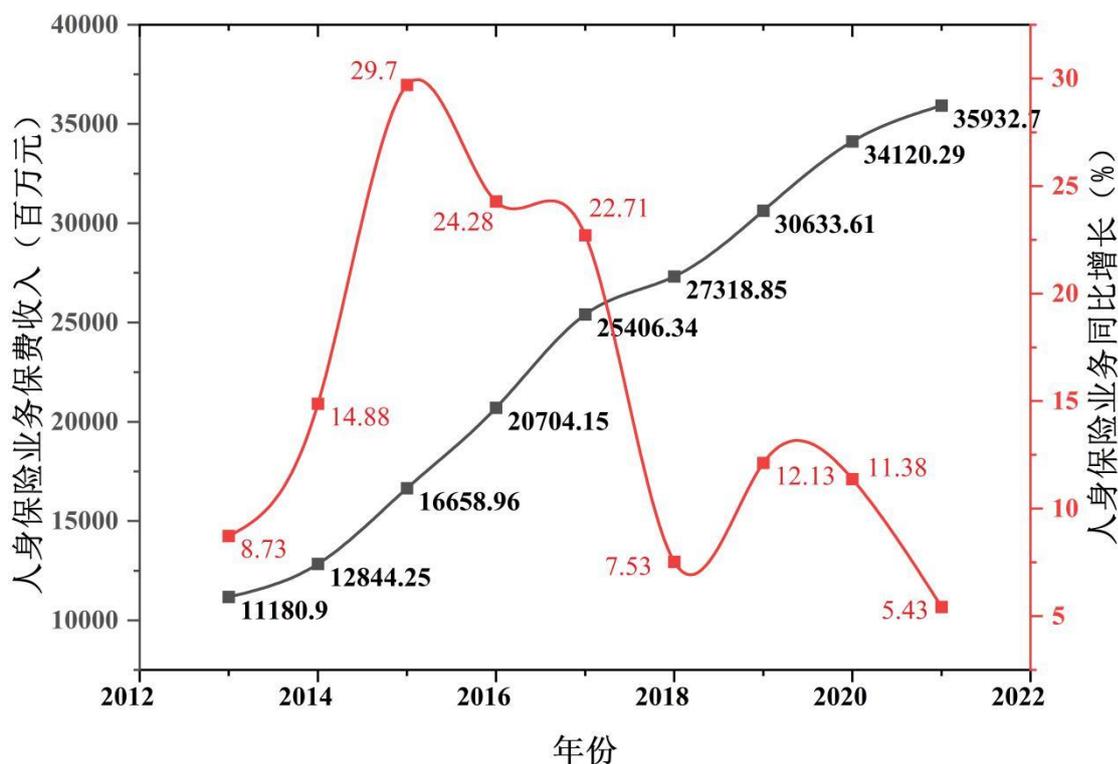


图3.5 2013-2021年甘肃省人身保险保费收入和同比增长变化情况（注：2013-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3.3 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发展问题分析

3.3.1 商业养老保险监管体系不完善，市场缺乏秩序

由于目前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比较缓慢、基础薄弱、行业标准不明确以及现行的监管法规单一，使得监管成效不佳，市场秩序混乱。

首先，我国的商业养老保险市场的法律法规主要依据《合同法》与《保险法》等，而甘肃省在立法上存在不确定性，并无专门的立法来保障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从而不利于商业养老保险市场的管理；其次，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监管体系主要由中国保监会派出机构、政府和行业协会等组成，然而在实际运作中，这些机构之间的职责划分不够清晰，导致监管存在漏洞，同时，保监会外派的监管人员有限，对进入市场的经营主体监管不到位，大量资不抵债的公司涌入市场，造成市场秩序混乱；最后是信息披露不充分，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特点，消费者往往难以全面了解产品的保障范围、费率水平等信息，当前部分保险公司信息披露不充分，导致消费者在选择产品时存在误导^[58]。

3.3.2 税收优惠政策缺乏，商业养老保险发展动力不足

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与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相比，商业养老保险长期处于缺位状态，政策不足，优惠力度有限，商业养老保险发展动力不足，严重阻碍了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

甘肃省经济发展长期处于全国落后水平，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尤其缺乏，商业养老保险发展动力尤其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政策扶持不足且缺乏可持续性。甘肃省位于中国西北地区，经济发展长期处于落后水平，实施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时间也非常晚，目前的政策对于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扶持力度不够，缺乏明确的税收优惠政策，如税前列支、税收减免等，这限制了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空间，而且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也缺乏稳定性，一定程度上会对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二是税收优惠的激励效果有限。我国的征税结构是以增值税等间接税为主，个人所得税为辅，能够实施税收优惠的空间略显不足，加上优惠力度较小，使得税收优惠的效果不佳。三是投保手续繁琐，而部门机构效率低下。投保人参加税优型商业养老保险时涉及工作单位、社保、税务、保险机构等多个主体，主体复杂，手续繁琐，比如税务机关在办理过程中遇到的审批问题、扣除问题、实际情况下因个人收入变动而产生的复杂的税延限制问题，加上甘肃省相关部门机构协调性不足，工作效率低下，极大的削弱了投保人的积极性。

3.3.3 商业养老保险覆盖面有限，效果不佳

首先，目前甘肃省的商业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不灵活，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的主要受惠者为中、高收入群体和正规行业员工，而低收入、家庭主妇、灵活就业以及非正规部门员工很难成为受惠主体。以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为例，受惠主体是能够取得劳动报酬的个人、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法人以及合伙制企业自然人等。首先，根据税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优惠政策，其中最大的受惠主体是高收入人群，因为高收入人群能从中获利更多，而对于获利较少的低收入人群来说，其参与的积极性会更低。其次，就特殊群体而言，例如独生子女、失独家庭和丁克族，目前甘肃省尚无保险机构为其设计针对性的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因此，必须进一步拓展商业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最后，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定位不明确，忽略了农村市场，把绝大多数的农民排除在外，从而使得城乡保险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3.3.4 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种类单一，无法满足消费者多样化养老需求

相对由政府主导的基本养老保险和由政府引导的企业年金，商业养老保险是纯粹基于市场化运营的，因此对于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来说，产品的多样化是至关重要的。目前，甘肃省保险市场上的养老产品种类少、同质性高，缺乏以年龄、地区、收入等为条件的差异化保险产品，绝大多数是有缴费期限的年金保险，无法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缺乏市场竞争力。比如，就城镇和农村居民而言，其对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就存在差异，城镇居民受教育程度深、风险意识强、收入水平高，而农村居民的风险意识相对而言就比较薄弱，收入水平低，保费承受能力也相对较弱，因而农村居民更倾向于保费和收益相对较低的低风险商业养老保险产品，而城镇居民更倾向于高收益高风险的商业养老保险产品。但目前寿险市场上并未针对城镇和农村居民设计差异化的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城镇和农村居民的需求均未得到有效满足，商业养老产品同质化严重，缺乏市场竞争力。

3.3.5 公众保险认知不足，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意愿不强

随着近年来甘肃省政府和保险机构的推广和宣传，广大居民的风险意识和对养老保险认知有所提高，但其认知水平仍未达到预期，根据《国人养老准备报告》的最新一项调查，69%的调查对象至今没有做好退休的财产准备，这表明公众对保险的认知不足。尤其是现阶段广大民众对商业养老保险的认知不够深入与全面，不能有效区分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和其它金融产品，因此对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购买意向不强。

公众保险认知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保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许多公众对保险的认知仅限于车辆、财产等有限的险种，对于养老保险等长期规划型保险产品的认知不足，没有充分认识到保险在应对突发事件和长期规划方面的作用；二是对商业养老保险的理解不够。很多人对商业养老保险的特点、优势以及如何购买等了解不够，对其提供的保障和长期投资价值认识不足，因此缺乏购买的意愿；三是受传统观念影响。甘肃省一些公众受传统观念影响，养儿防老、国家养老等观念根深蒂固，对于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等现代金融产品缺乏兴趣；四是对保险公司的信任度不高。一些公众对保险公司的信任度不高，认为保险公司可能存在欺诈、误导等问题，因此不愿意购买其产品。

4 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前面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的论述中,认为从需求侧方面存在人口、经济、社会三大要素会影响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并从文献分析的角度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先对不同因素进行定性分析,再对其进行定量的解释。在本章中,我们首先从人口、经济、社会三个层面选取6个对商业养老保险需求产生影响的因子,对其做出定性分析,然后利用相关的统计数据,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定量解释。

4.1 研究假设

本文从需求维度出发,以人口、经济、社会三个层面为切入点,分别选取了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代表人口因素,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代表经济因素,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代表社会因素,并对各个因子作出研究假设:

(1) 人口因素的假设

H1: 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对商业养老保险需求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对商业养老保险具有挤出效应,在我国参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居民,大多数对商业养老保险的购买倾向会降低,减少对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

(2) 经济因素的假设

H1: 人均GDP与商业养老保险需求呈正相关关系。

随着人均GDP的增长,人民的财富会越来越多,生活水平也会相应提高,对养老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进而会提高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

H2: 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能正向影响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

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居可用于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资金增多,从而商业养老保险需求将会相应增加。

H3: 消费物价指数会负向影响养老保险需求。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提高,说明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上涨,居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成本就会上升,从而大幅削弱购买意向,使得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下降。

(3) 社会因素的假设

H1: 教育支出能正向影响商业养老保险需求。

随着教育投入的增加，教育普及率以及居民受教育程度提升，进而能够提升人们的养老风险意识和对养老保险的认知，增强人们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意向，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也会随之增长。

H2：甘肃省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与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呈负相关关系。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能够双向影响商业养老保险需求。一方面，社会保障对商业养老保险会产生替代效应和挤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增加会提高人们的养老金水平和就业率，进而增加人们的收入，在保障目前生活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居民其实会更倾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来实现自身的多样化需求，在某种程度上会促进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

4.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4.2.1 数据来源

本文在前面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的论述中，认为从需求侧方面存在人口、经济、社会三大要素会影响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本章基于甘肃省 14 个地级市 2017-2021 年相关因素的截面数据，研究其对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影响效果，本章数据来自国家和地方统计年鉴、银保监官网。

4.2.2 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

(1) 被解释变量

人寿保险保费收入是衡量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核心指标。通过对甘肃省 14 个地级市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状况综合分析后，结合人口规模对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影响，选择了 2017-2021 年甘肃省 14 个地级市各年平均人寿保险保费收入的混合截面数据对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进行研究，这里将人寿保险保费收入，即保险密度作为被解释变量，记为 Y 。

(2) 解释变量

本文在前面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的论述中，认为从需求侧方面存在人口、经济、社会三大要素会影响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鉴于相关统计资料的获取与处理难度，本章以人口、经济、社会三个层面为切入点，分别选取了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代

表人口因素，记为 X1；人均 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代表经济因素，记为 X2、X3 和 X4；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代表社会因素记为 X5 和 X6。

表 4.1 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及其含义

变量	名称	符号	预期方向
被解释变量	保险密度（万元 / 万人）	Y	
解释变量	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X1	-
	人均 GDP（元 / 人）	X2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 人）	X3	+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一期=100)	X4	-
	教育支出（万元）	X5	+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万元）	X6	-

4.2.3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般来说，在进行实证分析前需要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找到其内部的分布规律与趋势，以便更好地了解数据。本文利用 spss 统计软件对甘肃省 14 个地级市的 490 个混合截面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 4.2）。

如表 4.2 所示，原始数据的极小值、极大值、均值以及标准差都位于合理区间，初步说明这些数据具有可用性；同时发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标准差为 0.63，数据中没有出现离群值，较为集中，说明各地区消费价格水平差距不大，相对稳定，而保险密度、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人均 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教育支出、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的均值和标准差的差异较大，其中人均 GDP、教育支出以及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标准差甚至分别达到 26646.51、204592.38 和 137463.11，这反映了甘肃省 14 个地级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表 4.2 样本总体的描述性统计情况

变量	符号	观测值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保险密度	Y	70	450.51	4178.45	1905.58	1197.34

续表 4.2

变量	符号	观测值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X1	70	13.08	229.26	113.23	229.26
人均 GDP	X2	70	11411.00	119418.00	39457.81	26646.51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X3	70	19380.21	47863.30	31144.03	6647.86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X4	70	100.10	102.68	101.65	0.63
教育支出	X5	70	41249	882874	385724.01	204592.3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X6	70	20804	598499	280568.77	137463.11

数据来源：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整理所得

4.3 多重共线性检验

在回归模型中如果多个解释变量之间存在高度相关关系，此时模型预测失很难进行，这就是多重共线性问题。在实践中解释变量间高度相关的这种纯共线性情况并不多见，一般出现的是一定程度相关的近似共线性。本研究主要使用自变量相关系数矩阵法与方差膨胀因子法检验回归模型的解释变量间是否有多重共线性问题。

4.3.1 相关系数矩阵法检验

相关系数矩阵法检验事实上就是分析不同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根据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判定多重共线性。判定依据是变量间的简单相关系数，0.8 是临界值，如果两变量间的简单相关系数大于 0.8，初步说明它们之间线性相关；如果多个变量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都大于 0.8，则说明回归模型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使用相关系数矩阵法分析变量间相关性时，考虑到抽样过程中的随机因素会在一定程度上干扰样本数据间的相关性，影响其对整体相关性的反映，通常需要对相关系数矩阵进行显著性检验，如果通过了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检验，就说明了相关系数矩阵法能够有效的反映出整体的关联度。本文通过相关系数矩阵法对 X1、X2、X3、X4、X5 以及 X6 进行了验证，得到了它们之间的相关性矩阵，如表 4.3 所示，根据相关系数矩阵的显著性检验结果，X1、X2、X3、X4、X5 以及 X6 的相关系数基本都通过显著性检验，因而可以反映出整体的关联度，判定多重共线性。根据表 4.3 可知，X2 与 X3 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887，X1 与 X6 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924，X5 与 X1、X6 之间对应的相关系数

分别为 0.887、0.942，相关系数都大于临界值 0.8，且其都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回归模型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但多重共线性的强度需要进一步检验。

表 4.3 相关系数矩阵及其显著性检验结果

	X1	X2	X3	X4	X5	X6
X1	1					
X2	-0.584***	1				
X3	0.431***	0.887***	1			
X4	0.095	-0.115	0.102	1		
X5	0.887***	-0.386***	0.264**	0.107	1	
X6	0.924***	-0.516***	0.388***	0.06	0.942***	1

注：以上数据来源于实证分析结果整理所得，*表示 $P < 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

4.3.2 方差膨胀因子法检验

根据相关系数矩阵法检验结果，回归模型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为了进一步确定是否具有多重共线性以及多重共线性的强度，本文又利用方差膨胀因子法检验多重共线性。VIF 是用于确定多重共线性强度的指标，判定标准为：当 $0 < VIF < 10$ ，无多重共线性；当 $10 < VIF < 100$ ，存在多重共线性；当 $VIF > 100$ ，存在较强的多重共线。根据原始数据，利用统计分析软件 stata，求出了 X1、X2、X3、X4、X5 以及 X6 的 VIF 检验值。

表 4.4 各变量的 VIF 检验值

Variable	VIF	1/VIF
X1	8.57	0.116753
X2	6.53	0.153184
X3	4.99	0.200593
X4	1.06	0.947065
X5	11.38	0.087846

续表 4.4

Variable	VIF	1/VIF
X6	14.64	0.068294
Mean VIF	7.86	

数据来源：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整理所得

实验结果显示：X1、X2、X3、X4、X5 以及 X6 的 VIF 值分别为 8.57、6.53、4.99、1.06、11.38 以及 14.64，在本文所选取的解释变量中，只有 X5 以及 X6 的 VIF 值大于 10，但其所有变量的 VIF 值的均数为 7.86，小于 10，这说明存在轻微多重共线性。

根据相关系数矩阵法和方差膨胀因子法的检验结果可知，采用上述方法所建立的多回归模型构建良好，轻微的多重共线性并不会对模型的预测产生明显的影响。

4.4 实证分析

4.4.1 模型构建

(1) 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本文选择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研究相关因素对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影响，假定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如下：

$$Y_{it} = \beta_1 X_{it1} + \beta_2 X_{it2} + \beta_3 X_{it3} + \beta_4 X_{it4} + \beta_5 X_{it5} + \beta_6 X_{it6} + \varepsilon_{it} (i = 1, 2, \dots, 14; t = 1, 2, \dots, 5)$$

其中：Y 是保险密度；X1 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X2 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X3 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4 是消费者物价指数；X5 是教育支出；X6 是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ε 为扰动项；i 代表地区，i=1, 2, 3...14，t 代表时间，t=1, 2, 3...5(1 代表 2017 年，2 代表 2018 年，依此类推，5 代表 2021 年)。

(2) OLS 分析

根据上述被解释变量 Y 和解释变量 X1、X2、X3、X4、X5、X6，对收集的 490 个观测值进行 OLS 分析，结果如表 4.5 所示。

表 4.5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OLS
X1 (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7.383441** (-2.26)

续表 4.5

变量	OLS
X2 (人均 GDP)	0.0213922*** (3.25)
X3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052392** (2.27)
X4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2.54231 (-0.11)
X5 (教育支出)	0.0024488** (2.16)
X6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0.0012166 (-0.64)
CONS	937.545 (0.08)
Observations	70
R-squared	0.7924
Adj R-squared	0.7726

注：以上数据来源于实证分析结果整理所得，***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1$ 。

4.4.2 对多元回归模型的相关检验

Source	SS	df	MS	Number of obs	=	70
Model	78379604.7	6	13063267.4	F(6, 63)	=	40.07
Residual	20540341.5	63	326037.166	Prob > F	=	0.0000
				R-squared	=	0.7924
				Adj R-squared	=	0.7726
Total	98919946.2	69	1433622.41	Root MSE	=	571

图 4.1 实证结果呈现

(1) 拟合优度检验

判定系数 R^2 也叫拟合优度、可决系数，它是说明模型对样本数据的拟合程度的。显然， $0 \leq R^2 \leq 1$ ，且 R^2 越高，数值越接近 1，说明数据的拟合程度越好。根据实证结果，

样本判定系数为： $R^2=0.7924$ ，样本调整的判定系数为： $Adj R^2=0.7726$ ，说明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样本观测值拟合程度较好。

(2) t 检验

假设原假设： $H_0: \beta_j=0 \quad j = 1, 2, \dots, k$

备择假定： $H_1: \beta_j \neq 0$

统计量为：

$$t^* = \frac{\hat{\beta}_j - \beta_j}{SE(\hat{\beta}_j)} = \frac{\hat{\beta}_j}{\hat{\sigma}\sqrt{C_{jj}}} \sim t(n-k-1)$$

给定显著性水平 0.05，查自由度 63 时 t 分布表的临界值 $t_{0.025}(63)$ ， $1.994 < t_{0.025}(63) < 2.000$ ，根据实证结果可知，变量 X1、X2、X3 以及 X5 对应的 t 统计量的绝对值均大于 2，这说明在 5% 的显著水平下， β_1 、 β_2 、 β_3 以及 β_5 均显著不为零，X1、X2、X3 以及 X5 对 Y 具有显著影响；而变量 X4 和 X6 对应的 t 统计量的绝对值均小于 1.994，这说明在 5% 的显著水平下，X4 和 X6 对 Y 的影响不显著。

(3) F 检验

假设原假设： $H_0: \beta_1 = \beta_2 = \beta_3 = \beta_4 = \beta_5 = \beta_6 = 0$

备择假定： $H_1: \beta_1、\beta_2、\beta_3、\beta_4、\beta_5、\beta_6$ 至少 1 个不为 0

建立统计量：

$$F = \frac{ESS/K}{RSS/(n-k-1)} \sim F(k, n-k-1)$$

给定显著性水平 0.05，查 F 分布表得临界值 $F_{0.05}(6, 63)$ 为 2.246，根据实证结果图 4.1 可知， $F(6, 63)=40.07 > F_{0.05}(6, 63)=2.246$ ，则拒绝 $H_0: \beta_1 = \beta_2 = \dots = \beta_k = 0$ ，说明回归模型有显著意义，即所有解释变量联合起来对 Y 有显著影响。

(4) 经济意义检验

根据 OLS 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写出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方程表达式：

$$Y_{it} = -7.383441X_{it1} + 0.0213922X_{it2} + 0.052392X_{it3} - 12.54231X_{it4} + 0.0024488X_{it5} - 0.0012166X_{it6} + \varepsilon_{it} \quad (i=1,2,\dots,14; t=1,2,\dots,5)$$

根据上述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方程表达式可知，X1、X4 和 X6 的系数分别为 -7.383441、-12.54231、-0.0012166，说明甘肃省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消费价格指数以及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会负向影响保险密度；X2、X3 以及 X5 的系数分别为 0.0213922、0.052392、0.0024488，说明人均 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教育支出能够正向影响保险密度，但系数值都偏小，单个因素产生的影响并不大。

4.5 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 OLS 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看到这 6 个因素联合对保险密度都具有显著影响，即对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发展具有显著影响，具体结论如下：

在人口因素方面，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对甘肃省人寿保险保费收入具有负向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每提升 1 个单位，甘肃省人寿保险保费收入将下降 7.383441 个单位，这是由于甘肃省大多数居民仍处于国家养老固有思维中，认为参加了国家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安享晚年，所以当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增加时，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就会下降。这说明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对商业养老保险具有挤出效应，基本养老保险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

在经济因素方面，人均 GDP 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能够正向影响甘肃省人寿保险保费收入，消费价格指数会负向影响甘肃省人寿保险保费收入。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均 GDP 每提升 1 个单位，甘肃省人寿保险保费收入将增长 0.0213922 个单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长 1 单位，甘肃省人寿保险保费收入将增长 0.052392 个单位，消费价格指数每提高 1 个单位，甘肃省人寿保险保费收入将下降 12.54231 个单位，人均 GDP 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直接反映的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消费价格指数直接反映是一定时期当地消费品和服务的价格水平，说明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能够直接影响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

在社会因素方面，教育支出对甘肃省人寿保险保费收入具有正向的影响，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会负向影响甘肃省人寿保险保费收入。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教育投入每增加 1 个单位，甘肃省人寿保险保费收入将增加 0.0024488 个单位，教育投入会直接影响当地教育水平和大众的受教育程度，这说明随着政府对教育投入的不断增加，大众的受教育水平和保险意识也会相应提高，从而会增加商业养老保险的有效需求；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每增加 1 个单位，甘肃省人寿保险保费收入将减少 0.0012166 个单位，这说明社会保障的投入对商业养老保险具有替代效应，甘肃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大部分居民保险意识弱，认为社会养老就足够了，社会保障投入的替代效应大，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加会减少商业养老保险的有效需求。

5 国内外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基本经验借鉴

5.1 国外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基本经验

5.1.1 美国发展个人养老金的 IRA 制度

1935 年美国罗斯福总统签署《社会保障法》标志着美国现代化养老保险制度的开始，而后《社会保障法》覆盖的范围不断扩大，成为美国覆盖最广的养老保障制度，也就是第一支柱。与此同时，作为第一支柱的补充，20 世纪 70 年代私人养老金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使得雇主养老金计划和个人养老金计划也取得迅速发展，美国的养老模式最终形成了三支柱模式。第一支柱是社会养老保险（OASDI），包含“老年、遗嘱及残疾保险”在内，是社会最基本的养老保险，覆盖范围最广；第二支柱为雇主养老金计划，按照部门可分为公共和私人两个部门，其中公共部门以政府为主导，私人部门以企业为主导，按照资金付给方式又可分为 DB 计划（收益确定型）和 DC 计划（缴费确定型）；第三支柱是个人退休金账户计划（IRA），属于补充性养老金计划，联邦政府会提供税收优惠、个人自愿参加，该计划和 401(k) 计划一样享受税收递延的优惠，主要为个人退休账户中的传统 IRA 账户和罗斯 IRA 账户，还有少部分雇主发起式 IRA^[59]。下面本文将从 IRA 的税收优惠、缴费上限、投资管理以及收益率四方面介绍美国的 IRA 制度。

（1）IRA 的税收优惠

IRA 属于补充性养老金计划，联邦政府会提供税收优惠、个人自愿参加，该计划和 401(k) 计划一样享受税收递延的优惠。按照 IRS 公布的 2022 年美国传统 IRA 和罗斯 IRA 账户税收细则，若在设立 IRA 账户时同时参与了雇主退休计划，则相应的税收优惠将随着收入的上升逐渐减少，当收入超过一定数额时，IRA 账户将不再享有税收优惠，即每年向 IRA 所缴费用不再抵扣应税收入；若没有参加雇主退休计划，则没有收入限制，具体如图 5.1 所示。因此，按照美国个人所得税法，在没有参与雇主退休计划时，IRA 账户每年通过缴费最高可以带来 2405 美元的税收优惠（按照 37% 的所得税率，50 岁以上为 2775 美元）。

表 5.1 未参加雇主退休计划的 IRA 账户缴费税收减免

申请状态	调整后总收入水平	税收减免
------	----------	------

		比例
单身、户主或符合条件未亡配偶	任何数量	全部减免
已婚共同或分开申请，配偶也没有雇主退休计划	任何数量	全部减免
已婚共同申请，配偶有雇主退休计划	小于等于\$204,000	全部减免
	\$204,000-\$214,000	部分减免
	大于等于\$214,000	无减免
已婚分开申请，配偶有雇主退休计划	小于\$10,000	部分减免
	大于等于\$10,000	无减免

注：来源于 IRS，东方证券研究所

(2) IRA 的缴费上限

与 401(k) 计划一样，为了促进公平，IRA 账户也设置了缴费上限，如图 5.2 所示，1974 年传统 IRA 账户建立时，缴费上限为 1500 美元，为促进第三支柱发展、缓解社会养老压力，美国政府不断提升 IRA 账户限额，IRA 的缴费上限持续提升。根据 IRS 公告，IRA 的缴费上限从 1974 年 1500 美元增加至 2023 年 6500 美元，50 岁及以上可追加 1000 美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约 10%。

表 5.2 IRA 缴费上限变化时间

时间	缴费限额调整（不包括追加缴费）
1974 年	1500 美元或工资的 15%取较低值
1981 年	调整为 2000 美元或工资的 100%取较低值
2001 年	调整为 3000 美元
2005 年	调整为 4000 美元
2008 年	调整为 5000 美元
2013 年	调整为 5500 美元
2019 年	调整为 6000 美元
2023 年	调整为 6500 美元

注：来源于 IRS，东方证券研究所

(3) IRA 计划:自主管理，投资标的丰富多样

IRAs 账户允许参与者自主管理，按照偏好自己选择资金配置方向。IRAs 账户资金的主要流向也是共同基金，但近年来共同基金在 IRAs 总资产中占比逐年下降，已从 2007 年的 51%下降至 2022 年的 43.6%，资金配置逐渐多元化。从 IRAs 账户的资金投向来看，截至 2022 年末，共同基金占比 43.6%，银行等机构存款 5.6%、寿险 4.6%、其他资产 46.2%。从 IRAs 账户持有的共同基金类型看，截至 2022 年末，共同基金配置类型为国内股票

42.5%、国际股票 12.5%、债券 16.8%、货币市场 8.6%。同 401(k) 参与者一样，年龄和不同账户类型配置偏好不同。

(4) IRA 账户投资收益率高，增值保值效应明显

根据 ICI 披露的 IRA 资产和净现金流量表，将每年的资产增量扣除净现金流入后除以年平均资产作为 IRA 投资收益率，通过计算可以看出，IRA 投资收益率较为可观，1998-2021 年平均达 6.1%，并且 IRA 投资收益率与标普 500 总回报指数变化趋势高度相关，1998-2021 年相关系数达到 0.96，反映了 IRA 资产配置中股票占比较大，账户收益率与市场走势几乎保持一致，较高投资收益率从存量和流量两方面促进资金保值增值。从存量来看，较高的投资收益率使得 IRA 资金存量规模持续增长，在保值的同时不断增值，据我们测算，1998-2021 年期间，由资产收益率带来的资金增量占 2021 年 IRA 账户资金总规模约 63.3%；从流量来看，较高的投资收益率可以吸引更多的新投资者投入资金，同时叠加缴费限额上升的影响，已经参与 IRA 的投资者也会因较高的投资收益率而增加资金投入。

5.1.2 日本发展个人养老金计划的主要税收政策

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日本受人口老龄化影响更深，其对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关注也更早。早在 1985 年日本就初步形成了二层公共养老金体制，即国民年金、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后续又进行多轮养老金制度改革，最终形成了三支柱养老体系：第一支柱是国民年金和厚生年金，第二支柱是多类型雇主养老金计划，第三支柱是个人养老金计划。面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和养老金财政危机，日本大力发展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先后建立了个人型定额供款养老金计划（iDeCo）和个人储蓄账户计划（NISA）。通过这两个相辅相成的养老金计划，日本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不仅成功缓冲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冲击，还有效化解了政府的养老金财务危机^[60]，日本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能取得如此成效，主要得益于 iDeCo 和 NISA 中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

(1) 个人型定额供款养老金计划的主要做法

个人型定额供款养老金（iDeCo）计划是根据 EET 模式进行税收优惠的，投保人在缴费和投资阶段不需要缴税、领取阶段进行缴税，在缴费、投资以及领取三个阶段的具体做法如下：首先是在缴费阶段的税收优惠。缴费额度内投入 iDeCo 账户的资金进行免税，为防止收入差距扩大，iDeCo 计划的最高缴费额度由投保人的职业类型确定；其次是在投资阶段的税收优惠。投资者可以自行选择日本国家养老基金联合会提供的投资项

目，使用 iDeCo 账户中的资金进行投资，由此取得的投资收益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最后是在领取阶段的税收优惠。在领取阶段设计了两种领取方式，分别为一次性领取和分析领取，根据领取方式的不同给予不同的税受减免。

（2）个人储蓄账户计划的主要做法

个人储蓄账户（NISA）计划根据初级、普通以及定投 NISA 三种模式进行税收优惠的。不同模式适合人群不同，初级 NISA 适合未满 20 周岁的日本青少年，普通以及定投 NISA 适合已满 20 周岁的日本居民；不同模式对于免税投资额和期限也不同，初级 NISA 的免税期限为 5 年，免税投资额为 400 万日元，普通 NISA 的免税期限也为 5 年，免税投资额上升至 600 万日元，定投 NISA 的免税期限为 20 年，免税投资额甚至高达 800 万日元，正是由于 NISA 计划高额的免税额度，使其发展迅速。

根据日本最新的 NISA 计划改革方案，日本将从免税期限和免税额度上再次进行改革，计划将免税期限由原来的 5 年和 20 年统一调至永久，NISA 账户每年的免税额度也进一步提高了，且为了维护税收优惠的公平性，防止低收入群体无法最大程度上享受税收优惠，向高收入群体倾斜，扩大收入差距，政府还规定了终生的投资上限。

5.1.3 德国李斯特养老金计划

面对日益严峻的人口压力，德国法定养老金支付水平下降，使得德国养老基金缺口不断扩大，于是进行了李斯特养老金改革，李斯特养老金计划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私人属性的养老金计划，个体自愿参与。2001 年德国李斯特改革确定了 3 个具体的、分阶段、可量化的目标，分别是稳定公共养老保险缴费率、引入化人补充性养老金计划以及降低 pay-as-you-go 体系的福利待遇水平^[61]。下面本文将从李斯特养老金计划的储蓄激励机制以及特征两方面进行介绍。

（1）李斯特养老金计划的储蓄激励机制

李斯特养老金计划激励方式有三种，分别是直接补贴、税收折扣以及所得税延期。其中直接补贴又包含基础补贴以及儿童津贴：具有补贴资格的个体只要按时缴费、按时提交补贴申请就能够获得直接补贴，且只要参与者有子女就可额外获得儿童津贴；税收折扣指的是在折扣限额范围内通过缴费抵扣应缴个人所得税，相对于直接补贴而言，税收折扣属于隐性补贴，高收入群体一般都会选择税收折扣，因为其税收折扣额大于直接补贴额；所得税延期就是个人所得税延期至领取阶段缴纳，本质上实施的就是 EET 模式，在领取阶段由于收入水平和税率的下降，缴税额会减少，激励效果明显。

（2）李斯特养老金计划的特征

李斯特养老金计划具有四个典型特征，分别是养老责任主体多元化、储蓄激励手段多样化、个人选择具有自主性以及监管严格。首先是养老责任主体多元化，在改革之前，个人是养老的缴费主体，而李斯特养老金计划是通过直接补贴、税收折扣及所得税延进行激励的，缴费主体变成了个人和国家，养老责任主体成了多元责任主体；其次是储蓄激励手段多样化，李斯特养老金计划是通过直接补贴、税收折扣及所得税延进行激励的，其中直接补贴是显性补贴，税收折扣是隐性补贴，补贴手段多样化，激励措施可满足不同类型家庭的需要；然后是个人选择具有自主性，李斯特养老金计划是具有私人属性的补充性养老计划，民众自愿参与，具有充分的自主性，能够依据自身家庭情况，自主灵活选择补贴方式以及根据自身的风险容忍度选择最适合的养老产品，使自身获益最大化；最后是严格的监管体系，在产品审批上就有 11 条标准，只有产品满足全部标准后才能获得政府提供的补贴，且产品供给者必须按公开透明原则披露规定的相关信息，政府还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养老金计划的运营与监管。

5.2 国内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基本经验

5.2.1 上海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经验

2018 年 4 月 2 日国家正式发布《关于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上海市率先启动个税递延商业养老保险试点，试点前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发展仍面临一系列问题。

从试点前期取得的成果来看，以行业分布为切入点发现目前个税递延商业养老保险发展主要有两个特征，分别为公司高度集中和产业高度集中。公司高度集中主要体现在参与个税递延商业养老保险主体上，上海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国际机场有限公司职工占参保总人数的比例就高达 28.11%，产业高度集中主要体现在参与个税递延商业养老保险行业上，集中于航空业、财产保险、人寿保险以及商业养老年金等行业^[62]。

通过对从近三年试点取得的成效来看，个税递延商业养老保险整体发展情况并不理想，综合分析后发现有以下三点原因：首先是所得税改革提升了起征点，使得个税递延商业养老保险受益群体少，覆盖面变窄；其次是税收优惠政策激励有限，优惠力度不足，国家出台的试点规范中规定个税补缴税率为 7.5%，只有月收入 8000 元以上的群体才能享受到优惠，且规定了 1000 元的税延上限，大幅削弱了居民参保的积极性；最后是参

保流程繁琐，效率低，投保人参加税优型商业养老保险时涉及工作单位、社保、税务、保险机构等多个主体，主体复杂，手续繁琐，大幅降低了居民的参保意愿。

5.2.2 重庆专属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经验

2021年5月14日银保监会正式发布《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开展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这是专属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正式开始的标志。重庆市率先开启了试点工作，试点期间重庆银保监根据重庆市实际发展情况，积极推进专属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最终取得了不错的成效。截至2022年6月，重庆开展的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已完成保费4499.26万元，覆盖10465人次，截止10月末，“福寿年年”保费达到3400万元，累计服务人次6831人，而新业态人员占比89.3%，这为灵活就业的“新市民”提供了新的养老选择^[63]。

在专属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期间，重庆银保监局主要实施了以下四个措施：首先是降低试点企业的初始成本。对6家试点企业的初始费用、管理用、转换费用以及追加费用进行减免甚至全免；其次是积极探索了“主管部门支持、行业联动、企业自主选择”的试点模式，且以“行业增信”的方法提升了宣传效果；然后是加强了监管力度，通过加强市场行为、信息披露以及内控服务监管的方式，增强了市民对政策以及产品安全的信任度；最后是建设了“金渝网”大数据平台，通过数据平台可共享全市银行保险机构以及政府的公共数据，从而能够使养老保险产品研发的数据得到进一步积累，优化专属型商业养老保险产品。

5.3 经验借鉴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的日益加剧，人们对养老保险需求不仅不断增加且更加多样化，目前基本养老保险已无法满足现状，而商业养老保险基于市场行为的补充性养老保险，能够有效弥补基本养老保险的不足，缓解政府和社会的养老压力。无论是从美日德国家的实践经验上看，还是从国内税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和专属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情况来看，都普遍意识到税收优惠的力度及深度、税收优惠的公平性以及严格的法律监管对于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重要性。

首先是需要注重税收优惠力度及深度。为了缓解政府的养老压力，新兴的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的税收优惠必须有足够的优惠力度及深度，覆盖足够多的人群，才能吸引公众

的参与。从发达国家时间经历来看,例如美国的 IRA 计划,该计划和 401(k) 计划一样享受税收递延的优惠,按照美国个人所得税法,在没有参与雇主退休计划时,IRA 账户每年通过缴费最高可以带来 2405 美元的税收优惠;日本的个人储蓄账户(NISA)计划根据初级、普通以及定投 NISA 三种模式进行税收优惠,免税投资额分别高达 400、600、800 万日元,节税效果显著;李斯特养老金计划是通过直接补贴、税收折扣及所得税延进行激励的,其中直接补贴是显性补贴,税收折扣是隐性补贴,补贴手段多样化,激励措施可满足不同类型家庭的需要。从国内来看,上海税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效果不佳就是因为是所得税改革提升了起征点和税延上限过低,使得个税递延商业养老保险受益群体减少,覆盖面变窄,国家出台的试点规范中规定个税补缴税率为 7.5%,只有月收入 8000 元以上的群体才能享受到优惠,且规定了 1000 元的税延上限,大幅削弱了居民参保的积极性。

其次是需要注重税收优惠的公平性。在制定商业养老保险税收优惠政策时必须注重税收优惠的公平性,防止税收优惠向高收入群体倾斜,扩大贫富差距。从发达国家时间经历来看,例如日本的 iDeCo 计划依据不同收入群体,设置了不同的投资限额,NISA 计划为了维护税收优惠的公平性,防止低收入群体无法最大程度上享受税收优惠,向高收入群体倾斜,扩大收入差距,政府还规定了终生的投资上限;德国的李斯特养老金计划通过直接补贴、税收折扣及所得税延进行激励,居民能够依据自身家庭情况,自主灵活选择补贴方式以及根据自身的风险容忍度选择最适合的养老产品,使自身获益最大化,可满足不同类型家庭的需要。从国内来看,税延型商业养老险在推广时没有针对不同的人群作出不同的设计,政府也没有针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提出针对性的优惠政策,贫困落后地区没有获得更高的优惠政策。

最后是需要注重法律监管。不管是保险行业还是税收优惠政策的施行都需要有规范的法律法规保障。从发达国家时间经历来看,德国在制度设计层面,不仅制定了严格的准入机制,还设置了严格的产品审批机制,在产品审批上就有 11 条标准,只有产品满足全部标准后才能获得政府提供的补贴,且产品供给者必须按公开透明原则披露规定的相关信息,政府还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养老金计划的运营与监管。从国内来看,重庆专属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期间政府加大了对试点机构的监管力度。通过加强市场行为、信息披露以及内控服务监管的方式,增强了市民对政策以及产品安全的信任度,最终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6 深化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对策建议

甘肃省位于我国西北地区，经济发展落后，近年来人口老龄化形势愈加严峻，基本养老保险无法满足广大老年人口多样化需求，而商业养老保险是基于市场行为的补充性养老保险，能够有效弥补基本养老保险的不足，满足老年人口多样化的养老需求，如何深化商业养老保险发展已经成为甘肃省省政府应当考虑的重要课题。通过对甘肃省人口老龄化以及商业养老保险现状问题分析，结合商业养老保险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本文从政府、保险公司以及个人角度三个角度提出深化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对策建议。

6.1 政府角度

6.1.1 全力促进经济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差距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可以为商业养老保险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通过前面章节对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对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高，人均可支配收入就高，进而能够提高商业养老保险的有效需求，促进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

甘肃省位于西北地区，主要以农业主导产业，工业发展相对较落后，现代服务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相对薄弱，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水平低。甘肃省省政府应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同时应充分考虑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发展经济时对农村地区进行适当的政策倾斜，缩小城乡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实现全省经济均衡发展。

6.1.2 加大教育投入，提升公众风险保障意识

通过前面章节对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发现，教育支出对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政府教育投入增加有利于当地教育的发展，人们的文化水平、社会认知水平以及风险保障意识也会随着不断提高，从而对商业养老保险的有效需求也会随之增长，促进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

甘肃省经济发展水平低，教育落后，导致公众风险保障意识弱，对保险认知不足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保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许多公众对保险的认知仅限于车辆、财产等有限的险种，对于养老保险等长期规划型保险产品的认知不足，没有充分认识到保险在应对突发事件和长期规划方面的作用；二是对商业养老保险的理解不够。很多人对商业养老保险的特点、优势以及如何购买等了解不够，对其提供的保障和长期投资价值认识不足，因此缺乏购买的意愿；三是受传统观念影响。一些公众受传统观念影响，养儿防老、国家养老等观念根深蒂固，对于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等现代金融产品缺乏兴趣；四是对保险公司的信任度不高。一些公众对保险公司的信任度不高，认为保险公司可能存在欺诈、误导等问题，因此不愿意购买其产品。甘肃省省政府应该加大教育投入，提升公众的总体的知识文化水平以及风险保障意识，加深公众对商业养老保险的认知，从而提高商业养老保险的有效需求，促进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发展。

6.1.3 完善税收优惠政策，提供商业养老保险发展动力

税收优惠政策对于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至关重要，政府可以通过扩大覆盖范围、提高针对性、优化实施方式、加强监管和评估等多种方式进一步完善商业养老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

一是扩大税收优惠政策的覆盖范围：政府可以考虑将税收优惠政策覆盖到更多的养老机构和服务，包括非营利性养老机构、服务机构等，以促进养老产业的发展；二提高税收优惠政策的针对性：政府可以针对不同的养老服务和产品，制定更加具体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对养老住宅、设施的建造和开发，提供住宅服务可以享受成本抵扣企业所得税等税收优惠；三是优化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方式：政府可以采取更加灵活的实施方式，例如对符合一定条件的养老机构和个人给予税收减免、加速折旧等优惠措施，以更好地促进养老产业的发展；四是加强税收优惠政策的监管和评估：政府可以加强对税收优惠政策的监管和评估，确保优惠政策能够真正惠及到养老机构和个人，同时对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和反馈，以便及时进行调整和优化。

6.1.4 加强市场监管，引导保险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离不开政府的有效监管，政府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强市场监管：一是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对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监管力度，规范市场秩序。同时，应建立专门的商业养老保险监管机构，明确其职责和权力，确保市场的健康发展；二是

加强信息披露管理，应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规范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方式。同时，应加强信息披露的监督管理，对于存在信息披露不充分、误导消费者的保险公司应给予严厉处罚；三是加强监管协作，应加强保监会、地方政府和行业协会之间的协作，形成有效的监管合力。同时，应加强国际合作，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共同推动商业养老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四是保护消费者权益，应加强对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监管力度，防止保险公司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欺诈行为。同时，应建立健全的投诉处理机制，及时处理消费者投诉案件，保护消费者权益。

6.2 保险公司角度

6.2.1 持续创新服务平台与内容，提升服务水平

保险公司是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提供主体，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离不开保险公司的努力，因此提升保险公司的服务水平显得至关重要，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优化保险公司的服务水平：首先可以建立官方的线上“云服务”平台，构建多层次的人工服务和人工智能服务窗口，提供集线上购买、缴费、投诉以及监督于一体的一键式服务，方便参保者了解产品信息，简化购买手续；其次需要加强保险公司从业人员的管理培训，设置定期考核标准，提升员工的专业素养和销售能力。最后还需要重视保险产品的售后服务，定期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回访客户，向购客户普及商业养老保险相关的优惠政策以及新的衍生品等方面的基础金融知识，增加客户粘性，提升售后服务水平。

6.2.2 根据当地人口、经济、社会情况，加大保险产品创新力度

与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相比，商业养老保险是基于市场行为的补充性养老保险，其优势在于灵活性和多样性，能满足不同人群的多样化需求。但目前市场上商业养老产品趋于同质化，缺乏差异性，因此甘肃省的商业保险机构应该根据当地人口、经济、社会实际情况从以下几个方面解决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种类单一、市场竞争力不强的问题：一是提高创新能力。保险公司应加大研发力度，培养创新意识和能力，关注当地人口、经济、社会实际情况，迎合市场需求变化，推出更多符合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养老保险产品；二是拓展市场需求。保险公司应加强对公众的保险教育，提高公众对养老保险产品的认知度，引导公众形成多元化的养老需求，从而拓展市场需求，丰富产品种类；三是加强

与相关行业的合作。保险公司可以加强与银行、基金等金融机构的合作，共同开发更多符合消费者需求的多元化养老保险产品。同时，还可以与医疗机构、养老社区等机构合作，提供更全面的养老服务，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

6.2.3 加大商业养老保险宣传力度

由于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对社会的认知以及风险意识的限制，大多数居民对商业养老保险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商业保险机构需要加大商业养老保险的宣传力度，让社会成员了解商业养老保险的作用，对商业养老保险形成正确认识。保险公司可以通过讲座、公益活动等形式向社区群众普及商业养老保险的相关知识，同时通过互联网多渠道投入广告宣传，推广商业养老保险产品。

6.3 公众角度

6.3.1 转变思想观念，提升风险意识和理财意识

甘肃省地处西北，经济发展处于落后水平，广大居民对养老的认知依然停留在“养儿防老”和“国家养老”的传统观念中，认为子女会保障自己的老年生活，认为参加了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国家能够满足自己老年时期的需求，对基本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缺乏科学的认知。人们应转变思想观念，了解自身在养老中的责任，还应该加强保险知识的学习，认识到“保险”可以有效的应对风险，提升风险意识和理财意识，提前依靠保险规划养老生活，避免过度忧虑未来养老问题。

6.3.2 学习保险理财技巧，选择合适的养老保险

商业养老保险是由市场主导的，产品具有多样化的特点，甘肃省目前市场存在着多种类型的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对于个人来说，需要多学习有关保险方面的知识，提升自己的理财能力和技巧，依据自身特点、身体状况、可支配收入以及家庭情况，对比不同的养老保险产品，分析其优缺点，选择适合自己的商业养老保险产品。

7 结论与研究展望

7.1 主要结论

本文在人口老龄化加剧背景下，对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发展进行研究。首先分析了写作背景、目的和意义，以及梳理相关论题的国内外文献；其次梳理了正文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第三分析了甘肃省人口老龄化以及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现状及问题；第四实证部分，通过人口、经济、社会三个影响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重要维度，选取了人均 GDP、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这六个因子作为解释变量，然后选取保险密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再结 2017-2021 年甘肃省 14 地级市相关的经济数据资料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 在经济因素方面：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发展受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人均 GDP 以及人均可支配收入对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具有正向的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具有负向的影响。(2) 在社会因素方面：教育支出对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发展具有正向的影响，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对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发展具有负向的影响。(3) 在人口因素方面：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对商业养老保险具有替代作用，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对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发展具有负向影响。最后，针对前文的理论分析及实证结果，再借鉴国内外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基本经验，从政府、保险机构、公众三个角度分别给出促进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较为全面的建议，以深化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

7.2 研究展望

本文基于甘肃省 14 个地级市 2017-2021 年的省级截面数据，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甘肃省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受人口、经济、社会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且随着时间的变化，影响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因素也在相应的发生变化，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充分考虑这些因素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的情况。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美好物质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单纯依靠“保基本”的基本养老保险已无法满足人们对老年生活质量的需求，应大力推进商业养老保

险的发展，不仅可以提升我国人民的老年生活水平，也有利于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项重要的民生保障项目，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 [1] Anderson G F,Hussey P S.Population Aging:A Comparison Among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Populations around the world are growing older,but the trends are not cause for despair[J].Healthaffairs,2000,19(3):191-203.
- [2] Faruqee H.Population aging and its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J].2002.
- [3] Tamirisa N T,Faruqee H.Macroeconomic effects and policy challenges of population aging[J].2006.
- [4] Showers V E,Shotick J A.The effects of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on demand for insurance:Atobit analysis[J].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1994:492-502.
- [5] Li D,Moshirian F,Nguyen P,et al.The demand for life insurance in OECD countries[J].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2007,74(3):637-652.
- [6] Li G,Li Z,Lv X.The ageing population,dependency burdens and household commercialinsurance purchase:evidence from China[J].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2021,28(4):294-298.
- [7] Townley Peter G C,Boadway Robin W. Social security and the failure of annuity markets[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88,35(1):75-96.
- [8] VicenteNúñez-Antón,JuanManuelPérez-Salamero,MartaRegúlez-Castillo,Manue I Ventura-Marco,Carlos Vidal-Melia. Automatic regrouping of strata in the goodness-of-fit chi-square test[J].SORT-Statistics and Operations Research Transactions, 2019, 43(1):113-142.
- [9] Stanley F.A life cycle model of life insurance purchases[J].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73, 14 (1) :132-152.
- [10] Truett D B,Truett L J.The demand for life insurance in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A comparative study[J].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1990:321-328.
- [11] Browne M J,Kim K.An international analysis of life insurance demand[J].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1993:616-634.
- [12] Beck T,Webb I.Economic,demographic,and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life insuranceconsumption across countries[J].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2003,17(1):51-88.

- [13] Clara Busana Banterle. Incentives to Contributing to Supplementary Pension Funds: Going Beyond Tax Incentives[J]. Geneva Papers, 2002, 27: 555-570.
- [14] John Creedy, Ross Guest. Changes in the taxation of private pensions: Macroeconomic and welfare effects[J].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2008 (30) : 693-712.
- [15] Bradley T. Heim; Ithai Z. Lurie, Taxes, Income, And Retirement Savings: Differences By Permanent And Transitory Income, [J]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Volume 32, Issue 3. 2014. PP 592-617.
- [16] Vanya Horneff; Raimond Maurer; Olivia S. Mitchell, Putting the pension back in 401(k) retirement plans: Optimal versus default deferred longevity income annuities, [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Volume 114, 2020.
- [17] 张秋.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求的影响及对策——以广东省为例[J]. 社会科学家, 2018(01): 85-90.
- [18] 呼倩.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劳动供给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19, 34(04): 33-48.
- [19] 宋佳莹, 高传胜.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机制分析——基于劳动力供给与社会保障支出视角[J]. 经济问题探索 2022(11): 1-18.
- [20] 李昊. 人口老龄化、医疗负担与微观人力资本投资[J]. 统计与决策. 2021, 37(02): 88-92.
- [21] 张佩茹.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保障支出对家庭消费的挤出效应[J]. 商业经济研究. 2022(09): 47-51.
- [22] 陈武元, 陈名灏, 蔡庆丰, 吴冠琛. 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 养老与抚幼的“双重功能之争” [J]. 教育发展研究. 2023, 43(06): 34-55.
- [23] 朱德云, 王素芬. 人口老龄化对地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影响研究[J]. 财政研究. 2021(04): 76-89.
- [24] 竹志奇, 任金凤, 张平. 人口老龄化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基于财政“四本账”的机制梳理与综述[J]. 财政研究. 2022(08): 97-113.
- [25] 龙腾, 王海军. 人口老龄化对主权债务风险的影响研究[J]. 世界经济研究. 2023(02): 119-133.
- [26] 薛玮, 赵媛. 人口老龄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与居民消费——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9, 42(04): 162-168.
- [27] 齐红倩, 杨燕. 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障水平与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结余[J]. 南京社会科学

- 学.2020(08)
- [28]汪伟,靳文惠.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与收入不平等的动态演化[J].世界经济.2022,45(02):137-161.
- [29]张燕婷,董克用,王丹.持续推进养老金制度建设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J].中国行政管理. 2020(05):58-62.
- [30]王晓洁,陈肖肖,李昭逸.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税收政策:挑战与实现机制[J].税务研究. 2021(12):10-15.
- [31]胡显海,蒋若凡.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对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启示[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49(05):102-110.
- [32]周延礼.健全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J].清华金融评论 2022,(02):2.
- [33]孙洁.加大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支持力度[J].经济界. 2022(05):3-11.
- [34]范林.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商业养老保险互补发展初探[J].农业经济. 2018(09):116-117.
- [35]王贞琼.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协同发展探讨——基于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视角[J].当代经济. 2021(07):21-25.
- [36]张细松,刘静,张晓云.我国基本养老保险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关联性——基于养老基金视角的检验[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9,38(12):28-33.
- [37]贺潇霄.基本养老保险对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影响——来自 CHARLS 数据的证据[J].农业经济与科技.2022,33(22)
- [38]郑功成.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现状评估与政策思路[J].社会保障评论. 2019,3(01):3-29.
- [39]娄飞鹏.我国养老金三支柱体系建设的历程、问题与建议[J].金融发展研究,2020(02):69-74.
- [40]温来成,贺志强,张偲.我国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税收政策完善研究[J].税务研究,2021(12):16-22.
- [41]董艳华.天津城镇居民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影响因素研究[J].天津经济. 2019(01):29-34.
- [42]周海珍,吴美芹.金融素养、个人养老准备与商业养老保险决策[J].金融与经济, 2020(03): 35-42.

- [43]谢波峰,常嘉路.个税改革如何影响了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J].财贸经济,2021,42(07):49-66.
- [44]周林毅,刘婷婷.福建省宁德市农村居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影响因素分析[J].现代商业. 2022(02): 75-80.
- [45]刘姝池.商业养老保险改革中的国际经验[J].中国集体经济. 2021(14):1667-168.
- [46]许捷.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路径[J].中国农村金融. 2023(01):39-43.
- [47]赵振翔,王亚柯,王珊珊,孙守纪.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动态模拟研究——基于生命周期模型的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 2021(09):146-150.
- [48]周华林,李玉芳,袁中美.我国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方案优化[J].兰州学刊. 2022(07):131-149.
- [49]李鹏,张子欣.我国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政策模拟研究[J].保险研究. 2023(02):90-101.
- [50]刘金霞,刘晓宁.专属商业养老保险助力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发展探讨[J].金融纵横. 2022(06): 70-75.
- [51]汤阔淼.论新就业形态群体专属商业养老保险的制度构建[J].法学. 2023(01):181-192.
- [52]韩雪.第三支柱建设中的辽宁省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22.
- [53]陈志恒,胡桢.我国商业养老保险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J].税务与经济,2023(05).
- [54]杜鹏.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与社会保障体系发展[J].社会保障评论,2023,7(02),31-47.
- [55]王伟.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及对策[J].甘肃理论学刊,1993,(2).
- [56]刘丹.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现状、成因与对策[J].中国老年学杂志,2022,42(16),4123-4126.
- [57]陈燕儿,蒋伏心.人口老龄化、数字化转型与实体经济[J].现代经济探讨,2023,(10),23-32.
- [58]陈世杰.我国商业养老保险发展困境与对策[J].改革与开放,2019(20).
- [59]崔蓝月.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税收政策研究——以上海市为例[D].吉林财经大学,2021.
- [60]石响.我国个人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优化研究[D].兰州财经大学,2022
- [61]王化楠.德国李斯特养老金计划改革及对我国补充性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启示[D].西南财经大学,2016.

[62]周景明.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支持体系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21.

[63]李昕格.我国专属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研究[D].山西财经大学,2023.

后 记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三年的硕士研究生求学即将结束。回想期间的学习和生活，面对培育我的母校，心中无限感慨。春花秋月，寒来暑往，消逝的是时光，但增加的却是历久弥新的感情。研究生生涯即将结束，回想过去有刚入学时的欢喜，有上课时的充实，有期末考试时的抓狂，还有即将毕业时的各种不舍，现在回想这三年来的点点滴滴，必将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音符。

在兰州财经大学学习的这三年，我最想感谢的是我的导师柏正杰老师，柏正杰老师为人师表，治学严谨；在指导我研究生毕业论文的过程中一丝不苟，不仅在学业上对我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在人生的道路上也给了我很多的指导，我相信柏正杰老师给与我的人生指导一定会指引我走的更高、更远、更稳。同时，我还要感谢研究生期间我的每位授课恩师，是你们让我重新燃起了对知识的渴望，而且能够在短短的几十分钟的课堂上收获满满，这都得益于各位老师精湛的专业知识和深入浅出的讲解，我的所学必定会促使我进步。在这里还要感谢参加我答辩的各位老师，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对我的论文进行指导，这些指导不仅会对我的论文修改有莫大的帮助，给我的论文增添光彩，还会让我进一步深入聆听和感受老师们的教诲，让我的人生走出重要的一步！

在三年的学习中，我还认识了一众可爱的同学，是他们与我一起上课、一起下课，一起复习备战期末考试，一起分享了整个快乐的三年时光。同时，在论文撰写期间还有各位同学对我的论文提供了大量帮助，与我在图书馆查阅资料，互相分享写作心得，感谢你们。

最后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对象，陪伴了我整整三年，尤其是精神上的陪伴，情绪价值！